

以圖證史：明代澳門城市建置新考

湯開建*

1554年，汪柏與索扎達成協議，澳門半島向葡萄牙人開放，澳門正式成為各國商人聚居的貿易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澳門城市的建置與規模逐漸形成，迅速發展成為遠東一個重要的國際性貿易城市。然而，迄今為止，尚未見到關於澳門城市發展的深入研究成果。為了探求澳門城市的發展軌跡，本文以明代為限，利用現存的中葡文獻和歷史繪圖考證澳門早期城市的發展與建置。

在東亞古代城市發展史上，明代澳門城的興起乃一特殊的奇跡。一個位於香山縣南部頂端的小半島，在短短的幾十年中，竟發展成為四方商賈輻輳、天下奇貨匯聚的國際性貿易城市。正如西方史家所言，葡萄牙是人類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橫跨美、非、亞三大洲的全球性帝國，葡萄牙人所建立的殖民化城市，不僅是連接帝國的樞紐，而且是最先具有全球化特色的城市。他們將貿易和文化的網絡連成一片，這些世界性的城市在不同的空間以特殊的形式組織起來，對葡萄牙帝國的建立具有着決定性作用。⁽¹⁾ 澳門正是16世紀出現的“最先具有全球化特徵的城市”。關於澳門城市史的研究，目前尚是澳門史研究領域中一個被忽視的問題。若爾熱·曼努埃爾·弗洛雷斯 (Jorge Manuel Flores) 〈澳門16-17世紀歷史：正在進行中的某些考察〉一文中呼籲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擬以明代為限，利用現存的中葡文獻和歷史繪圖考證其早期城市的發展與建置。⁽²⁾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現今保存的16-17世紀的澳門東西方圖像資料非常豐富，如何使用這批圖像資料來還原澳門早期城市的風貌，仍是一項極為重要仍尚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澳門城區的形成與發展

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葡萄牙船長索札 (Leonel de Sousa) 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口頭協定後，澳門半島開始對外國商人開放，澳門正式成為各國商人聚居的貿易點。汪柏對葡人應允的條件究竟有哪些？所承諾澳門開放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今日均無文獻可憑。據有關資料推測，汪柏應允澳門對夷商的開放是有限制的，所以夷商初在澳門上岸時“僅篷累數十間”。⁽³⁾ 後來大概夷商們見明朝守澳官員並沒有對澳門進行嚴格管理，遂採用行賄的辦法，強行在澳門半島建屋蓋房。王士性記載當時情況較明：

其（夷商）初止舟居，以貨久不脫，稍有一二登陸而拓架者，諸番遂漸效之。⁽⁴⁾

剛開始通商時，這些來澳門貿易的夷商都住在船上，後有一兩個人帶頭上岸居住，由於明守澳官員沒有及時制止，“姑息已非一日”⁽⁵⁾，於是，“諸番遂漸效之”。商人都開始上岸建築自己的房屋倉庫以便貿易，即是《澳門記略》所言：“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甓榱桷為屋。”⁽⁶⁾ 據龐尚鵬

* 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言：“近數年來，(澳夷)始入濠鏡築室居住。”⁽⁷⁾龐文成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冬，“近數年”，約指近三至七年間，也就是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57-1562)，所以可以斷言，澳門開始有夷商之定居建築物，最早不會超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即澳門城區始建於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間。

澳門城區發展很快。平托《遠遊記》稱：

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割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裡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了一個大村落。裡面有價值三、四千克魯絮多的房屋，有大堂，代理主教，有受俸教士，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司法官員。眾人在那裡感到非常安全，如同在自己的家園一樣，如同該島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個地方。⁽⁸⁾

據龐尚鵬言：“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⁹⁾一區為一幢房屋，在上岸建築房屋的第二年就已發展到“數百區”，到嘉靖四十三年時，則發展到“千區”了。假定一位夷商建一區，則這時在澳門已有一千個夷商居住了。嘉靖四十四年遊澳門的葉權則稱：“今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¹⁰⁾這一時期記載澳門居住人口：1562年800人，1565年900人。⁽¹¹⁾但這800、900人均指移居澳門的葡萄牙已婚者，實際上一名已婚者就是一個家庭，當時的葡萄牙人家庭均蓄有奴僕。據博卡羅言：大約每一個葡人蓄奴6-10名。⁽¹²⁾故又有資料稱：1569年時，澳門有5000-6000基督教徒。⁽¹³⁾如果平均每位葡人蓄奴6名的話，則900位葡人蓄奴總數再加葡人數則與此大致相合。這一時期中文資料已有報導，龐尚鵬言：“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¹⁴⁾吳桂芳言：“況非我族類，不下萬人。”⁽¹⁵⁾這“萬人”，應包括當時進入澳門的華人，除掉6,000夷商及其僕隸，則華人約有4,000餘人進入澳門。據葡人學者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言：“首批葡人

定居在聖保祿山腳下。”⁽¹⁶⁾據潘日明神父提供的葡文資料，在萬曆五年(1557)時，在白鴿巢和沙欄仔碼頭的花王堂腳下已建起了一排葡萄牙人的住宅。這恐怕是葡人在內港岸邊建起的第一批住宅。⁽¹⁷⁾這是澳門城區初始期之原型。

隨着澳門對外貿易的繁榮，澳門成了“遠東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因為各種財富大量地從這裡運往各地交易。它有大量的貴重物品，它的市民比該國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多、更富有。”⁽¹⁸⁾不僅海外貿易發達，在城內與華商的交易亦很發達。《明史·佛朗機傳》稱：閩粵商人，趨之若鶩。⁽¹⁹⁾郭尚賓在萬曆中亦言：

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貨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畫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²⁰⁾

這些材料表明，澳門不僅僅是當時葡萄牙人與日本、菲律賓貿易的中轉站，而且澳門城內與華人的貿易也很繁榮，即已有“澳夷之市”的出現。

住宅區的成片形成及市場的出現，街道亦隨之出現。據白樂嘉言，1555年時，葡萄牙人即開始在澳門進行探測建城。所經路線，自媽祖廟前地起，經萬里長城、高樓街、風順堂街、龍嵩正街至大三巴，而後轉向嘉思欄山。當時的街道上全鋪上碎石，名曰“石仔路”。⁽²¹⁾澳門最早的一條街道即“十字街”，是一條“中貫四維”的十字大街。郭棐《廣東通志》卷六九載：

陳督撫又奏，將其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

分東西為號，東十號，西十號，使互相維繫稽察，毋得容奸，諸夷亦唯唯聽命。⁽²²⁾

這實際上是一條縱街與一條橫街交叉而成的十字街，被明廷分別命名為“畏字街”、“威字街”、“懷字街”、“德字街”，這四條街又被稱為“四街”，現存有萬曆乙巳歲(1605)“四街重修碑”。⁽²³⁾ 這條十字大街原本全是“諸夷”居住，但由於華商進入澳門者與日俱增。至萬曆乙巳(三十三年)時，其中“德”字街已為華商入居，至崇禎己巳(二年)時，華商則進一步發展至“懷”、“德”二街。這方面有考古資料為證，今澳門媽閣廟原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橫樑上仍刻有：

明萬曆乙巳年德字街眾商建，崇禎己巳年懷、德二街重修。⁽²⁴⁾

今考古材料不僅可以確言明萬曆時澳門已有一條“中貫四維”、東西各有十號的十字大街，而且還可以證明街旁居民除夷商外，到明末至少有一半居民是華商，因為要出錢修媽祖廟者應祇是華人。清初詩人釋跡冊詩“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²⁵⁾之“十字街”即此。

這條街出現在甚麼時候？考郭氏書中所言“陳督撫”，當指兩廣總督陳璘。據郭棐《(萬曆)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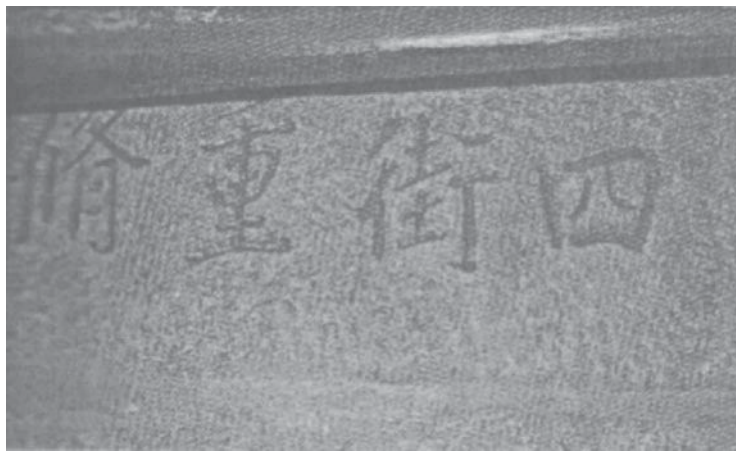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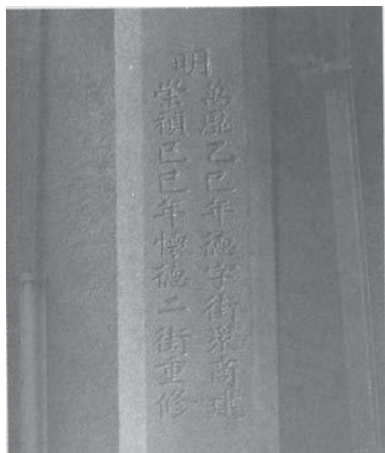
東通志》卷一〇，陳璘為應城人，“萬曆二十一以侍郎兼僉都禦史任”兩廣總督，⁽²⁶⁾則知這條澳門歷史上最早的十字大街應形成於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之前。澳門前輩學者王文達先生就早期的澳門街有所考證，稱：

攷澳門街，古祇大街，即今營地大街也。昔時該街之兩端，各設開門一度，東曰“石開門”，西曰“紅窗門”，中國設關扼守。所以，石開門外，今有關前街，而紅窗門之街名，今葡人譯作 Rua da Alfândega，即關卡也。且李家園內，其壁上舊有“澳門”兩個擘巢大字，所以標示此外方為澳門，但今已湮滅矣……當日澳門街之區域，祇限於此。⁽²⁷⁾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亦稱：

1573-1575年，澳門僅有一條兩旁設有木柵的通向四個街區的大街。⁽²⁸⁾

這應祇是反映萬曆初年澳門街道的情況。隨着澳門商業的持續繁榮，入居澳門的人口進一步增加，澳門街道隨之拓殖。據林家駿神父記載，17世紀初今龍嵩街即已成為商業中心，葡人至今稱之為中心街，當時龍嵩街多為官紳士庶的居所。⁽²⁹⁾



媽閣廟原神山第一亭正面橫樑石刻及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



布里繪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

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日本人入居澳門者日漸增多。王以寧〈請蠲稅疏〉載：

（澳門）藉口防番，收買健門倭夷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30）}

其〈條陳海防疏〉又載：

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從未有狡倭雜處其間者，有之，自萬曆二十年後始。^{（31）}

萬曆二十年（1592）後，日本人開始入居澳門，因為1587年，日本政府“下令驅逐傳教士，禁止信仰基督教”。^{（32）} 1597年豐臣秀吉將26名傳

教士與日本信徒釘死在長崎十字架上後^{（33）}，大批日本天主教徒避難澳門。1614年1月27日，德川家康又下令所有傳教士離開日本，當時日本天主教徒分乘五艘大船，其中兩艘去馬尼拉，三艘去澳門和暹羅。1636年又有嫁給葡人的日本婦女及其子女287人流放澳門。^{（34）} 這批日本人大都在三巴門一帶居住，“其中有不少建築家和藝術家，因此，耶穌會士認為是一個好機會，利用以工代賑的方法，召集此等日本教徒，來建築教堂（指大三巴寺）及宏麗之前門石壁”^{（35）}。據博克塞記載：

澳門的日本基督徒由於1614年、1626年和1636年日本流亡者和被驅逐者湧入而激增，就



1632年澳門要塞圖

自然組成了一條街，除了有葡萄牙人的妻妾、奴僕外，還有商人、教士。⁽³⁶⁾

這一以日本基督徒為主的居住區即“三巴廬寺街”。萬曆四十年（1615）廣東巡按田生金〈辨問矜疑罪囚疏〉：

三名嗎籲囉、嗎吱囉、嘩囉招稱，與監故四俱朝鮮國釜山人，幼被擄賣與佛郎機，帶至廣東香山澳，俱在三巴廬寺下街住。⁽³⁷⁾

“三巴廬寺”即聖保祿教堂（該堂1602年動土，1603年即建成，但前門之大牌坊則至1637年才完成，牌坊下石級則在1640年完工。）既有“三巴廬寺下街”，當還有“三巴廬寺上街”。這就是當時日本天主教徒在澳門居住的街區。日本人在其居住區內還於1623年建起了一座神學院。⁽³⁸⁾除了日本人居住區外，華人居住區在明萬曆中後期亦應形成。博克塞稱：

1642年，當勃拉艮薩公爵繼承葡萄牙國王位登上約翰四世寶座的消息傳到澳門時，……市民們為新國王的登基舉行了為期幾周的慶祝活動，特別是中國基督徒街區和日本基督徒街區。⁽³⁹⁾

16世紀末17世紀初，澳門城市的規模不僅表現在建築物和街道的出現上，而且在城市中還出現了許多“前地”。葡萄牙人稱為“前地”者，葡文有三個詞，即“Largo”、“Praça”和“Praceta”，詞義均為廣場。林永勝先生認為，澳門早期的前地應指教堂前具有露天宗教場地或貿易集市用途的小空地。前地有大小之分，“Largo”一般是指較小一點的空地，而“Praça”則指較大一點的廣場。⁽⁴⁰⁾1590年〈澳門城市圖〉即已出現多個“前地”，計有“議事亭前地”、“板樟堂前地”、“花王堂前地”及“龍嵩堂前地”等。⁽⁴¹⁾

到1632年〈澳門平面圖〉則更明標五個大的“前地”；每一個前地均立有一個十字架。⁽⁴²⁾



愛雷迪1615-1622年繪澳門平面圖



約翰·斯皮德1626年繪澳門圖

這些前地與街道交織而構成17世紀前期澳門城市空間。《芒迪遊記》還記錄了澳門“板樟堂前地”，這個前地可供“十五六名葡人騎馬擲瓦球”⁽⁴³⁾，可以反映這一前地相當寬敞，應該是17世紀澳門城市之中心。

愛雷迪（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約於1615年至1622年繪有澳門平面圖，圖中標明，當時葡人租居的澳門城區——“Macao”主要在靠近南灣的澳門半島中部地區，半島西南部及東北部均為中國官方控制的地區。⁽⁴⁴⁾

1626年約翰·斯皮德（John Spit）繪〈澳門圖〉，途中僅有一條由木柵圍起的中心街道通往各堂區。⁽⁴⁵⁾

而據保存在海牙的一副繪於1665年的早期澳門圖則顯示，澳門半島中部及南部地區已形成一片一片建築群區，各建築群區之間則組成了縱橫交錯的街道。圖中所示較大建築群區有二十幾處，街道則難以數計。⁽⁴⁶⁾ 據1689年的資料，當時澳門城市已分為大堂、風順堂、聖安多尼堂三個堂區。⁽⁴⁷⁾ 據1632年的澳門圖，可以推斷這三個街區大致在明末即已形成。⁽⁴⁸⁾ 這些均可表明，澳門城區從17世紀初到17世紀中葉即明朝滅亡之前已獲得了很大的擴充和拓展。

據博卡羅1635年的報導，當時澳門城方圓約半里格，最窄處為五十步，最寬處為三百五十步。⁽⁴⁹⁾ 至於居民人口則增長更快。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言：

今則高居大廈，不減城市，聚落萬矣。⁽⁵⁰⁾

一聚落當指一戶，16世紀末，澳門人口發展已達萬戶。萬曆二十九年（1601）遊澳門的王臨亨亦言：

今聚澳中者，聞可萬家，已十餘萬眾矣。⁽⁵¹⁾

又稱：

香山之夷，盤踞澳中，聞可數萬。⁽⁵²⁾

“十餘萬眾”恐怕有點誇大，“聞可數萬”應較接近事實。據博卡羅記錄1635年澳門人口數位：澳門有850戶葡萄牙人家庭，還有同樣多的土著家庭，他們全是基督徒。⁽⁵³⁾

據林家駿神父記載，到1644年時，澳門人口增至40,000。⁽⁵⁴⁾ 大量人口流入澳門，不僅是“四方商賈，輻輳咸集”⁽⁵⁵⁾，而且“百工技藝趨者如市”⁽⁵⁶⁾。所有這些資料均可說明，大約在明朝萬曆中期即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商貿城市已發展成熟，正如乾隆〈重修三街會館碑記〉所云：“遂成一都市焉。”⁽⁵⁷⁾ 所以，於西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4月10日葡印總督杜阿爾特·梅內塞斯在澳門居民的要求下，沿襲中世紀葡萄牙市政組織模式，並根葡西聯合王國國王菲利浦二世的批准，恩賜澳門稱城的特權，命名為“天主聖名之城”，並將澳門陞格為

擁有埃武拉市同等自由、榮譽和顯著地位的城市。⁽⁵⁸⁾

澳門公共建築的出現與發展之一：教堂

公共建築的大批出現與迅速發展促進了澳門城市的發展規模，而澳門公共建築的最重要表現形式則多與天主教的傳播密切相關。因為葡萄牙以天主教為國教，而天主教建立的權力體系成為社會和城區的凝聚因素，也致使澳門獲得國際上的認同。

澳門正式允許通商的第一年——1554年，就有耶穌會天主教士來到澳門，隨後，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教士紛紛來澳，並先後設立會院，建築教堂。可以說，澳門城市中最早出現的公共建築就是教堂。龔薩雷斯（Gregorio González）神父寫於1571年的信劄稱：

直到1553年，此時，有消息傳到印度說中國人想和葡萄牙人息兵議和，事實上確是這樣做了。接到這個消息之後，我被派到那邊去了。在第一年我同七名基督徒一道留在該地，我和其他人都被人囚禁了，直到次年船隻來時為止。次年，我主有給了我其實，因此，我使若干中國人皈依了耶穌基督的聖教，我留在這個島上，在島上已建起了一座茅草的教堂。那些開往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船隻來過之後，我還

是留在該地，同七十五名基督徒在一起，我們全體有一次被囚，他們囚禁我直到次年船隻到來之時，我們全體一起獲釋，我又把教堂修了起來。葡萄牙人把房屋修建起來。⁽⁵⁹⁾

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關於澳門開埠初期澳門城市建設的原始資料。這裡有幾個年份必須說明，因為議和完成是1554年10-12月，故文中的第一年應為1555年，則第一個“次年”則為1556年，第二個“次年”則為1557年。據此可知，從1555年起，澳門就建起了最早的教堂，但由於這兩座教堂均是用茅草搭起來的棚屋，故沒有保存下來。

一般人都認為聖拉匝祿堂（望德堂）、聖老楞佐堂（風順堂）及聖安多尼堂（花王堂）是澳門最古老的三座教堂，這三座教堂在荷蘭人狄奧多·布里於16世紀末繪製的〈澳門城市圖〉中均有記錄。⁽⁶⁰⁾

望德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又作聖拉匝祿堂、發瘋寺。文德泉神父認為建於1569年⁽⁶¹⁾；蒙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望德堂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中的望德堂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望德堂

塔納神父稱：“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和望德聖母堂建立的時間就是1557年。”⁽⁶²⁾ 郭永亮據1784年10月12日澳門葡人致北京主教書也認為建於1557年。⁽⁶³⁾ 余以為1557年說應該是較為原始的記錄，也就是說，望德堂應是澳門保存下來的第一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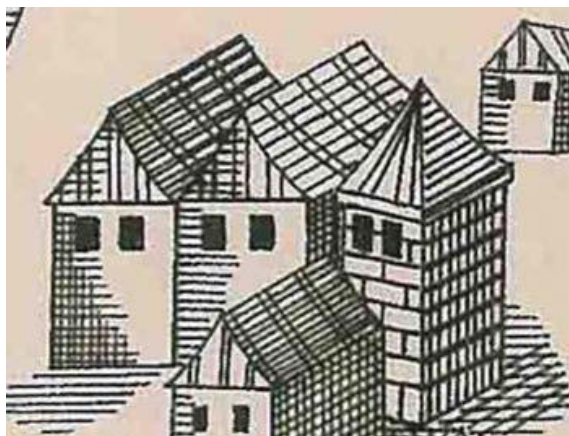
老楞佐堂（Igreja de São Lourenço），又稱風順堂、風信堂。林家駿神父認為始建於1558年，1618年重修⁽⁶⁵⁾；郭永亮根據傑瑟斯·馬里奧（Jesus Mario）神父之書認為建於1558-1560年間。⁽⁶⁶⁾

花王堂（Igreja de Santo António），又稱聖安多尼堂。林家駿神父認為建於1565年前⁽⁶⁸⁾，郭永亮則采亞拿以斯《澳門》一書之說，稱聖安多尼堂建於1558年至1560年之間。⁽⁶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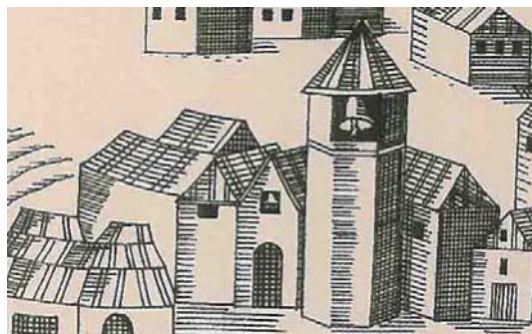
《澳門記略》亦記錄了這三座教堂：

西南則有風信廟，蕃舶既出，室人日跂其歸，祈風信於此（……）北隅一廟，凡蕃人男女相悅，詣神盟誓畢，僧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廟。（……）東南城有發瘋寺（因其後設麻瘋病院得名），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⁷¹⁾

但《澳門記略》並未說明三堂建立的時間。前引岡薩雷斯神父寫於1570年西班牙文抄本記載，葡人進入澳門不到十二年，就在那裡建起一個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風信堂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花王堂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花王堂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⁶⁷⁾之風信堂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花王堂

非常大的居留地，內有三座教堂。⁽⁷²⁾ 葡人正式入居澳門為1557年，下推十二年，則可以推斷上述三堂均始建於1569年之前。據傑瑟斯·馬裏奧神父言：

1558-1560年間，曾有數名耶穌會神父在此居住，商談籌建三座小教堂，即望德堂、老楞佐堂及聖安多尼堂。⁽⁷³⁾

據嘉靖四十四年（1565）吳桂芳言：“（澳夷）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⁷⁴⁾ 同年到澳門的葉權也見到“（番人）三五日一至禮拜寺”⁽⁷⁵⁾。這就可以證明，在1565年之前，澳門已有了教堂，當時居留澳門葡萄牙人已婚者已達900人，再加上信仰天主教的眾多僕役，初期極為簡陋的一座教堂無法滿足信眾的需要。因此，余以為這三座教堂大致均應設立在1557-1560年間，亞拿以斯《澳門》一書及傑瑟斯馬裏神父及蒙塔納神父的記載較為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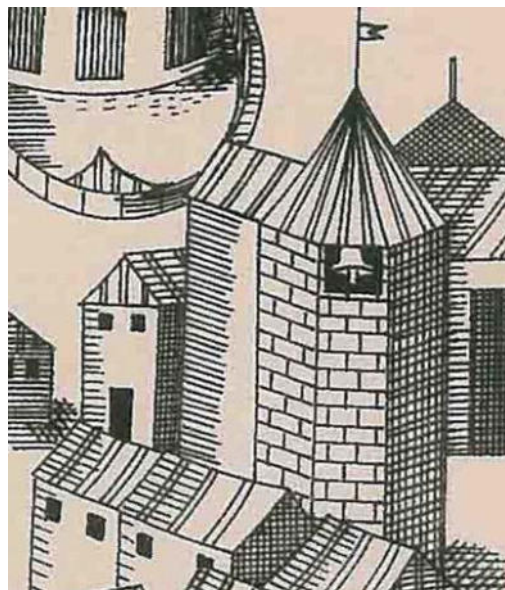
但必須說明的是，這時建起的三座教堂均為木棚搭起的簡陋建構。但至1590年代時，這三座教堂均已建成為磚石結構的建築。風信堂為兩幢“人字形”屋頂的兩層樓房及一幢三角形屋頂的兩層塔樓；望德堂為兩幢“人字形”屋頂的兩層樓房及三幢三角形屋頂的塔樓；花王堂規模最大，有六幢“人字形”屋頂的兩層樓房及一幢約為三層高的鐘樓。⁽⁷⁶⁾ 但真正能為澳門城市增添輝煌的石質結構的巍峨的西洋教堂的擴建均在17世紀。老楞佐堂建於1618年，望德堂重建於1637年，花王堂則重建於1638年。⁽⁷⁷⁾

16世紀建成的教堂還有五座：

一、天主聖母修道院和聖母瑪利亞教堂。這是澳門耶穌會建立的第一間住院與聖堂。該堂始建於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年初，並於1565年12月21日正式建成啟用，地點位於花王堂附近。初建之堂為稻草及木架構成，後由葡商維略納（António de Vilhena）捐資重建，於1573年建起了一座用黏土築成的聖堂。到1575年時又進行

擴建，住院已擁有十間寬敞的房間，還有客廳，被范禮安稱為遠東耶穌會最好的住院。到1580年時，該堂屋頂換成了瓦片，地面鑲上了木板。⁽⁷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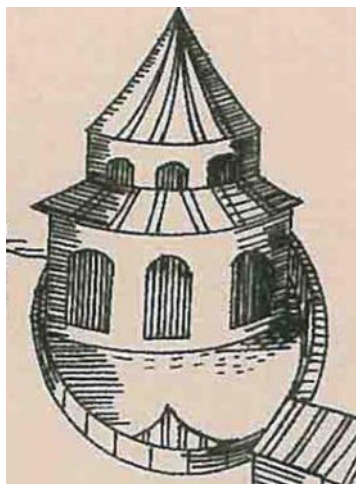
1590年〈澳門城市圖〉中聖母瑪利亞教堂（聖保祿教堂）已成擁有一幢兩層樓的樓房、一幢三層樓的樓房及一座高達三層的鐘樓。⁽⁷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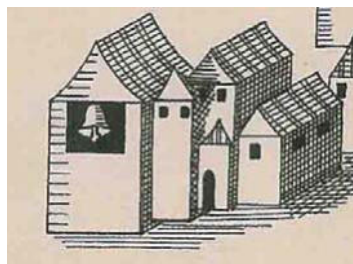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聖母瑪利亞教堂（聖保祿教堂）

二、噶斯蘭廟（Igreja de São Francisco），《澳門記略》稱：“東隅噶斯蘭廟。”⁽⁸⁰⁾ 亞拿以斯神父稱，噶斯蘭廟建於1579年，為聖方濟各會士建，乃聖方濟各會之修院。⁽⁸¹⁾ 其實1579年祇是噶斯蘭廟的始建時間，其落成時間是1580年2月2日。據黛烏斯（Jacinto de Deus）《植物與鮮花的樂園》載，聖方濟各天使聖母院在澳門南灣附近的小山上建立，修道院位於城東一片美麗沙灘起始處小山上，海浪拍打著修道院的圍牆，修道院東面和北面朝向大海。修士們在院內開辦了學校，有二十個青年在裡面受教育。⁽⁸²⁾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繪噶斯蘭堂為一尖頂的六角形、兩層高的教堂，靠海部分還有圍牆將該院圍住。⁽⁸³⁾

三、龍嵩廟（Igreja de Santo Agostinho）《澳門記略》稱：“龍鬆（嵩）廟在澳之西北。”⁽⁸⁴⁾ 龍嵩廟即聖奧斯定堂。亞拿以斯神父認為建於1575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嘉思欄堂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龍嵩堂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龍嵩堂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噶斯蘭廟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噶斯蘭廟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龍鬆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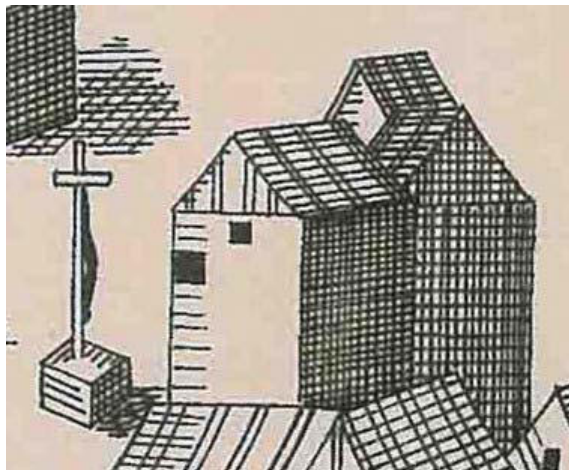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龍鬆廟

年至1578年之間，由奧斯定會士海拉達與馬林二人建。⁽⁸⁵⁾此說不準，奧斯定堂始建時間應是1587年12月，由孟利格神父建，他們當時買了一間由瓦片和麥秸搭成的小屋，長33英尺，寬33英尺。他們將這間木屋改建為聖堂和修道院，名為恩寵聖母修道院。但至1591年時，又將聖堂搬至磨盤山上（即今之崗頂）重建。奧斯定堂最初供奉慈惠聖母，內設有四個祭臺。⁽⁸⁶⁾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龍嵩堂為五幢建築物組成，三幢兩層樓高的樓房，其中一座為鐘樓，兩幢平房，其中一座為門樓。⁽⁸⁷⁾

四、板樟廟，《澳門記略》稱“有板樟廟，相傳廟故庫隘，貧蕃析樟板為之”⁽⁸⁸⁾。板樟廟即聖多明我堂（Igreja de São Domingos），又稱聖母

玫瑰堂，為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建。林家駿神父認為建於1588年⁽⁸⁹⁾，施白蒂認為建於1587年10月23日⁽⁹⁰⁾。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繪板樟堂為三座“人字形”屋頂的兩層樓房，樓門前為一空闊的廣場，即板樟堂前地，廣場中有一巨大十字架豎立。⁽⁹¹⁾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板樟堂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板樟堂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板樟堂

五、瑪爾定堂，據羅明堅稱，1580年，有一位義大利商人贈給了羅明堅300葡元，於是他就耶穌會住院後面的小山上創建了一座傳道所，叫聖瑪爾定堂。在這裡他一邊努力學習英文，一邊開始用中文向澳門華人宣教，當時在傳道所的華人教友有20人。羅明堅稱之為“經言學校”。⁽⁹²⁾ 科斯塔稱：“瑪爾定堂即在聖保祿教堂遺址處。”⁽⁹³⁾

至於大廟，《澳門記略》和《香山縣誌》均認為是澳門最早的教堂。《澳門記略》稱：

大廟者，夷人始至所建也，在澳之東南。⁽⁹⁴⁾

祝准《香山縣誌》卷四亦載：

大廟在澳之東南，即望人寺，夷人始在澳所建也。⁽⁹⁵⁾

大廟即大堂，亦即為主教座堂。澳門開始並無主教堂，直至1571年卡內羅主教在望德堂內搭一間木屋，作為主教公署，所以，望德堂一直是澳門的主教堂。然而，望德堂並不在澳城之內，而在澳城外望廈一帶。⁽⁹⁶⁾ 林家駿神父認為，1576年元月23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下諭成立澳門教區，立望德堂為第一座主教座堂。⁽⁹⁷⁾ 施白蒂稱，1576年1月23日，教宗將原有聖瑪利亞教堂升格為主教座堂，不過不是現在的主教座堂。⁽⁹⁸⁾ 很可能是1571年在望德堂建屋作主教署，但經教宗批准升格為主教堂則在1576年。《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均言大廟在“澳之東南”，而望德堂則在澳城之北，很明顯，上言之大廟不是指望德堂。



△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大廟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¹⁰³⁾之大廟

據《澳門記略》之〈正面澳門圖〉⁽⁹⁹⁾，大廟位於南環稅口附近；嘉慶十三年兩廣總督吳熊光奏摺所附〈澳門圖〉⁽¹⁰⁰⁾，大廟亦在南灣。故知《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中的“大廟”實指今澳門大廟頂上的“大堂”，英文名 Sé Catedral，亦即今日之主教堂。據郭永亮言，今之主教堂始建於1622年。⁽¹⁰¹⁾林家駿則稱，大約在1581年前後，便另建立教堂於大廟頂。⁽¹⁰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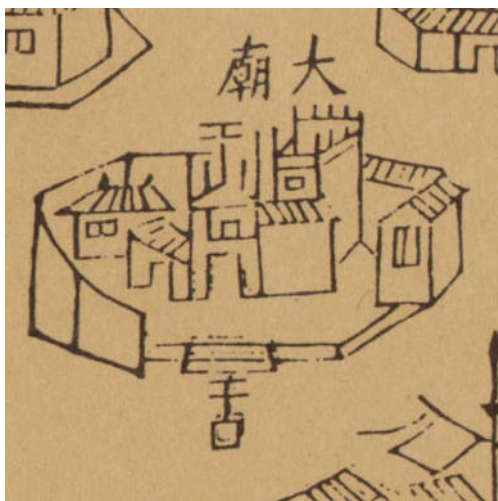
17世紀建起來的教堂最著名的就是聖保祿大教堂（Igreja de São Paulo），亦即聞名遐邇的“大三巴”。大三巴追源應始於開埠之初。文德泉神父稱：

1563年在報告葡國的耶穌會信中說：（……）除了到其他教堂，還有300葡國人到耶穌會聖堂與祭。這大約是原來的聖保祿堂，以木板和磚蓋成倉房形式，這是葡國習慣蓋的樣式。⁽¹⁰⁴⁾

文神父還說：

教皇額我略十三世在1576年澳門建立教區時說，這裡存在著一個聖母瑪利亞教堂。⁽¹⁰⁵⁾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亦載：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之大廟

他（卡內羅主教）於1583年8月19日在澳門去世，葬於城中心的聖保祿教堂。……1591年10月17日，麥安東神父在廣東省韶州（原譯作潮州，當誤）去世，他的遺體被運至澳門埋葬在聖保祿教堂。⁽¹⁰⁶⁾

明代戲劇家湯顯祖在萬曆十九年（1591）到澳門時亦曾見聖保祿教堂。《牡丹亭》中有“香山鑿裡巴”及“多寶寺”之言⁽¹⁰⁷⁾，“巴”當“三巴”之略，“多寶”亦為“聖保祿”之轉譯。實際上上述之“聖保祿教堂”即1565年建起的耶穌會在澳門的第一座聖堂：天主聖母修道院和聖母瑪利亞堂，也是耶穌會的住院。此堂與聖瑪爾定堂均為聖保祿教堂的前身。1569年一場大火將這一教堂化為灰燼，後修復，1601年又一場大火再次焚毀。於是，就在這一年，澳門葡商及市民決定第三次重修。據花奴利刺年報載，當時捐款達3,130巴度金元。1602年正式動工，1603年先在後面建成一教堂，而後來加建的保存至今的大三巴牌坊則完成於1637年。這次工程前後歷時三十餘年，僅牌坊一項耗資就達銀三萬兩。⁽¹⁰⁸⁾其建築之宏偉，裝飾之華麗，設備之完善，皆堪稱遠東教堂之冠。清龔翔麟云：

其寺曰三巴，高十餘丈，於屋側例啟門戶，石作形鏤，金碧照耀。⁽¹⁰⁹⁾

《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云：

寺首三巴，在澳東北，依山為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瑰麗。⁽¹¹⁰⁾

1637年到澳門的彼得·芒迪（Peter Mundy）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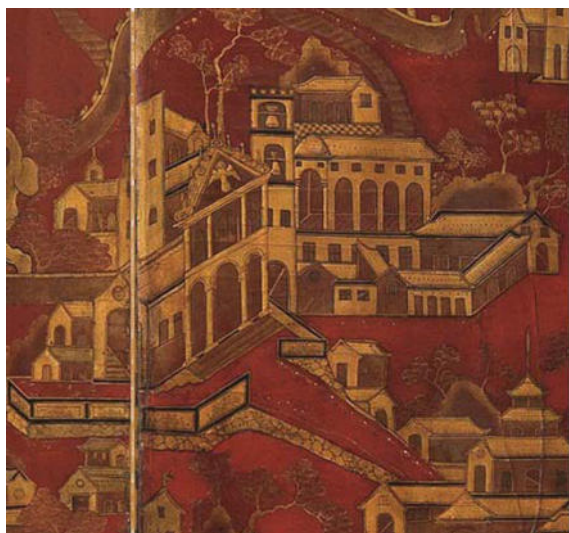
附屬神學院教堂之屋頂是我所記得、所見過的最優美的建築，製作精巧，木雕出自中國工匠之手，描金彩漆。彩漆有朱紅、天藍等，

斑斕絕倫。屋頂為方格組成，方格結合處則為一碩大的玫瑰，瓣葉重疊，進而逐漸縮小為一小圓球，垂懸於屋頂下一碼。此外，教堂前面尚有精美的牌坊，可循寬闊的多級臺階而上。⁽¹¹¹⁾

大三巴不僅是一座教堂，而且是一規模宏大的公共建築群（參見附圖35）。《澳門記略》稱“僧寮百十區”⁽¹¹²⁾，可證大三巴的規模。大三巴的建成，立即成為當時澳門城市的一大象徵。

17世紀除了重建的望德、老楞佐、花王三座最古的教堂外，還有1602年始建，1634年重建的阿巴羅教堂（Igreja de Santo Amparo）⁽¹¹³⁾，亦即《澳門記略》中的“唐人寺”⁽¹¹⁴⁾。1622年葡萄牙人在西望洋山建起了一座“法國之岩聖母教堂”。

該堂由奧斯定會捐資300葡元修建，於1622年4月29日正式建成啟用。該堂位於西望洋山山頂，初名為“卑拿教堂”，後修葺，並在大堂屋頂處豎有大理石雕刻的聖母像，故又稱為“西望洋聖母堂”。⁽¹¹⁵⁾東望洋教堂興建的時間不太明確，但據《大西洋國》中保存的葡文史料稱，1622年荷蘭人進攻澳門時就提到了東望洋山隱修院，可證，東望洋山教堂應建於1622年之前。該堂建成後之名為“白雪聖母隱修院”，後又稱為“導航聖母堂”。⁽¹¹⁶⁾1634年還建起了聖家辣教堂，亦即尼寺。1633年11月5日，澳門船隊總指揮方濟各會士菲亞略·費雷拉（Fialho Ferreira）從馬尼拉護送6名聖克拉拉（又譯聖家辣）修女抵達澳門，受到澳門人的熱烈歡迎。第二年4月30日，澳門議事會在東望洋山麓，今南灣街與水坑尾交會處建起一座聖堂，奉獻給“無原罪聖母”。該堂稱為聖家辣堂，華人俗稱“尼寺”。聖家辣堂建成時，堂內有12名修女居住。⁽¹¹⁷⁾到明朝滅亡之前，澳門城中教堂的興建教堂共十四座，其中兩座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時拆毀。“這些宗教機構的建立，教堂與修院的周圍，成為人們聚居之處。這些建築群及周邊具有世俗-宗教性質的空地（教堂前地），變成城市佈局的形象標誌”。⁽¹¹⁸⁾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之三巴堂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三巴堂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三巴堂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之唐人廟

明代澳門修建教堂表

時 間	堂 名	教堂歸屬
嘉靖三十六年 (1557)	望德堂	澳門教區
嘉靖三十七至三十九年 (1558-1560)	風順堂	澳門教區
嘉靖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 (1558-1560)	花王堂	澳門教區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聖母瑪利亞堂 (1594年拆)	耶穌會
萬曆七年 (1579)	嘉思欄堂	方濟各會
萬曆十五年 (1587)	龍嵩堂	奧斯定會
萬曆十五年 (1587)	板樟堂	多明我會
萬曆八年 (1580)	瑪爾定堂 (1594年拆)	耶穌會
萬曆三十年 (1602)	阿巴羅堂 (唐人廟)	耶穌會
天啟二年 (1622) 前	東望洋教堂	澳門教區
天啟二年 (1622)	大堂	澳門教區
萬曆二十二年 (1594)	大三巴 (聖保祿堂及神學院)	耶穌會
天啟二年 (1622)	西望洋堂	奧斯定會
崇禎七年 (1634)	聖家辣堂	方濟各會



△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尼姑廟

▽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之唐人廟



△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東望洋堂

▽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西望洋堂



△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東望洋堂

▽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西望洋堂



澳門公共機構的出現與發展之二： 其他公共建築

這一時期在澳門城中完成的公共建築除了教堂之外，西方建築還有議事亭、監獄、慈善機構、醫院、學校和工廠。澳門政府及澳門社會的公共機構，早期記錄不多。最主要就是議事會。議事會（即市政廳），是古代澳門城市的核心。

該機構於1583年4月成立，後在於南灣不遠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議事會公署，人稱“議事亭”。議事亭不僅是葡人管理澳門海上事務對澳門城市行使管理權的重要政府機構，還是負責與中國政府聯繫、溝通的澳門葡人的官方機構。議事會修成時是甚麼形狀？據布里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離南灣不遠處有一連六幢“人字形”屋頂的兩層樓樓房，這應該就是當時的議事會及監獄的所在第。在房子的前面有一座三角形亭子似的建築，但有牆，並非中國式的涼亭，那應即是議事亭。整個議事會建築四周無圍牆⁽¹¹⁹⁾，但《澳門記略》中保存了一幅〈議事亭圖〉，該建築為一兩扇門的院落，四周有圍牆，中間為十八根樑柱支撐四面無牆的亭子式結構建築，亭後有一排房屋。

從圖中表現的建築形狀看當為中國式的古建築群⁽¹²⁰⁾，這應是重新改建後的議事會建築，但這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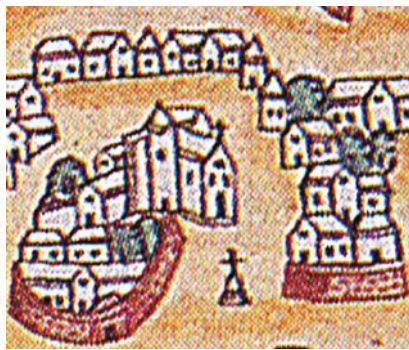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之議事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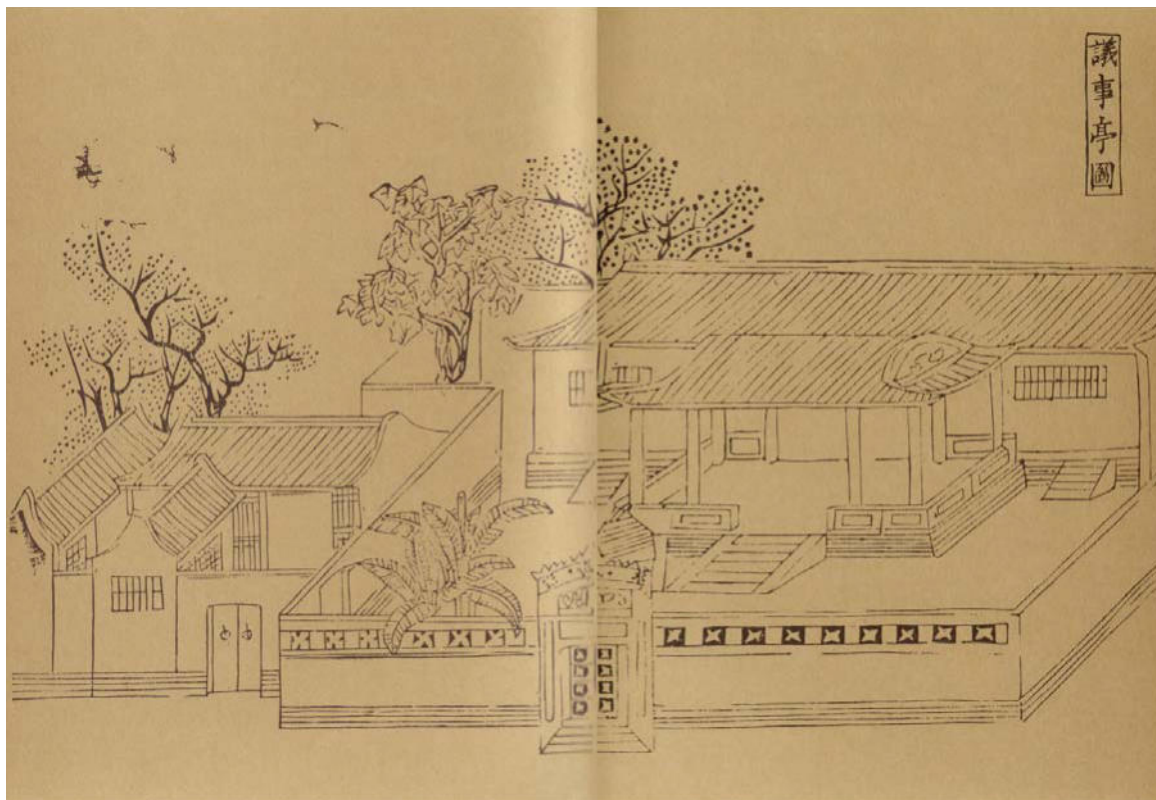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議事亭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議事亭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議事亭



《澳門記略》之議事亭圖

國式風格當為中國畫匠想當然的加工。議事亭始建於何時？郭永亮言，建於萬曆十三年至十五年（1583-1585）間。乾隆《香山縣誌》卷六稱：

（王）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¹²¹⁾

王綽出鎮澳門在萬曆五年（1577）後，卒亦當在萬曆中，可見，議事亭之建成亦當在萬曆中，與郭說相合。

在議事亭旁設有澳門監獄，監獄也是澳門議事會的屬下機構。《澳門記略》載：

獄設龍嵩廟右，為樓三重，夷罪薄者置之上層，稍重者系於中，重則桎梏於下。⁽¹²²⁾

文德泉稱：

澳門議事會大樓最初的建築物要追溯到1584年，那時該建築已附設監獄或牢房。從那時起，舊監獄巷和牢房街的命名，與公共街道連在一起。⁽¹²³⁾

從現存〈議事亭圖〉看，澳門監獄在議事亭左側，有另外的門出進，共有三幢樓房，均為兩層建築。布里〈澳門城市圖〉在議事亭旁亦為三幢兩層的樓房，完全相合。⁽¹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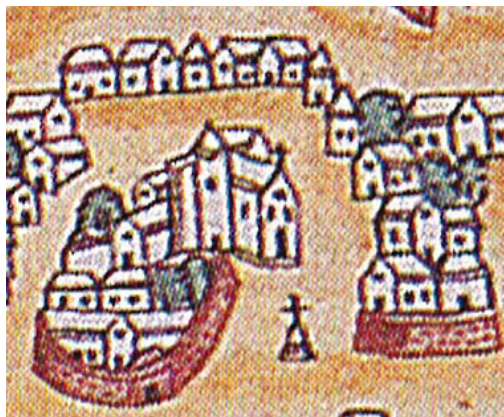
最早建成的公共機構還有仁慈堂。仁慈堂，又稱“支糧廟”，是早期澳門最為重要的慈善機構，其屬下有兩家醫院和一所孤兒院（育嬰堂），主要任務是幫助無法靠自己謀生的窮人、幫助病人解除痛苦及收容孤兒棄嬰，其經費由政府及富商資助，創辦人是賈尼勞主教。仁慈堂建成於1568年，位於澳門議事亭前地側。它以“仁慈聖母”為主保，倣羅馬仁愛協會之制，專以補助

貧苦無告者之生活用品為職責，對葡萄牙“富人和商客”亦有安全保障作用，賈尼勞神父將澳門稅收的有分之五用作維持仁慈堂的經費。⁽¹²⁵⁾ 仁慈堂內還設有一育嬰堂；“如內地育嬰堂制，門側穴轉門懸鐸，置轉斗中，僧聞鐸聲至，收而育之。”⁽¹²⁶⁾ 布里〈澳門城市圖〉記錄了16世紀時仁慈堂的建築形狀：

仁慈堂位於議事亭稍近東北，有一幢“人字形”屋頂的兩層樓房，亦即文德泉神父所言葡人習慣蓋的樣式，以木板和磚蓋成的倉房形式。但明顯比議事會的兩層樓要高，其與議事會前的空地正好形成一個廣場，即後來稱之為議事亭前地。⁽¹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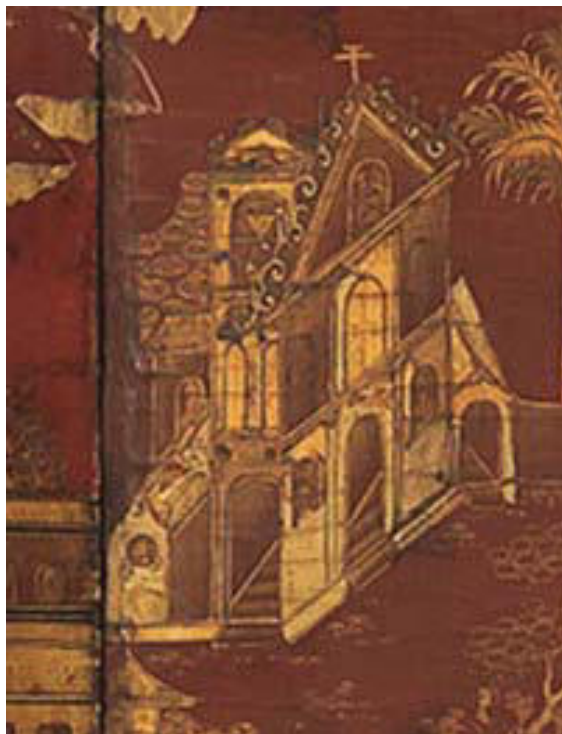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支糧廟作安娘廟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仁慈堂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仁慈堂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之仁慈堂

仁慈堂轄下還建有兩座醫院，1623年擔任澳門市政廳書記官的雷戈稱：

慈善堂出資建立了兩座醫院。(……) 這些修道院、教堂、慈善堂、醫院、慈善機構組成的整個系統靠日常和特殊的施捨以及當地人自願規定的某些捐贈建成，並支撐着這座城市。⁽¹²⁸⁾

一座為收留癲瘋病人的癲瘋醫院，最開始，癲瘋病院是設在貧民醫院內，後將癲瘋病人遷至澳城水坑尾門外望德堂後，建癲瘋病院，華人稱為“發瘋寺”或“瘋堂”。《澳門記略》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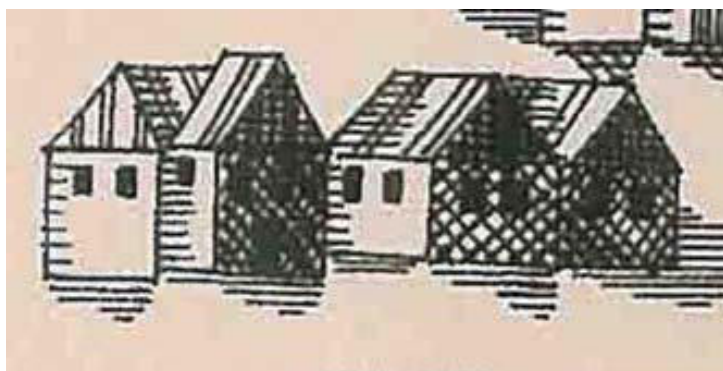
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月有廩。⁽¹²⁹⁾

布里〈澳門城市圖〉在圖的左上部分繪有望德堂，其正面為教堂，癲瘋病院當在其後。⁽¹³⁰⁾

仁慈堂屬下的另一座醫院為“貧民醫院”，與仁慈堂同時建立，亦由賈尼勞神父創辦。賈尼勞神父於1575年11月20日的信中說：

甫抵澳門，即開設醫院一間，不論教徒與否，一律收容。⁽¹³¹⁾

這間醫院華人稱為“醫人廟”。《澳門記略》卷下稱：



1590年代澳門城市圖之貧民醫院



1635年澳門要塞圖之貧民醫院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醫人廟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之醫人廟

別為醫人廟於澳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癯獨，有疾不能自療者，許就廟醫。⁽¹³²⁾

康熙初年陸希言的《澳門記》則稱：

又有別一堂，以病院為名，凡有病之男女老幼無扶持者，遠來孤旅無依者，皆歸於是而顧護之。(……) 至於濟眾博施，不特顧病者幼者，而貧者苦者，七月之內，兩給其衣食用。⁽¹³³⁾

明代貧民醫院即建在水坑尾處，規模有多大，尚無資料記錄，布里〈澳門城市圖〉在圖的左上部望德堂旁邊繪有四間人字形屋頂的平房⁽¹³⁴⁾，這應就是當時的貧民醫院。到1747年貧民醫院擴建時，醫院分了男、女兩個住院部，各有三十張床位⁽¹³⁵⁾。反映了貧民醫院的規模，到18世紀時有較大的擴展。

澳門的學校始建於明隆慶五年（1571），為耶穌會建。當時澳門耶穌會巡視員貢薩洛·阿爾瓦雷斯決定在聖瑪利亞小堂附近開設一家學校，是為兒童教授閱讀與書寫的學校，范禮安稱之為“兒童學校”。1572年，該學校正式開學。數年後，又增設拉丁文課程。至萬曆十二年（1584）年時，該學校的學生已發展到二百人，其課程又增加了算術、音樂及文法等⁽¹³⁶⁾。可知應是一座較有規模的學校。

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時，耶穌會日本教省為了培養赴日的傳教士，在范禮安的支持下，在澳門中部最高出的山崗建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聖保祿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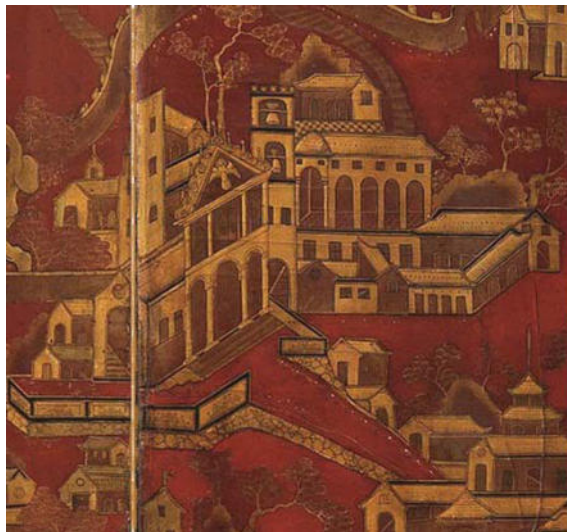
（聖保祿學院）依山而建，周圍有高牆環繞。兩間帶有閣樓的寬大房宇露出牆頭，如同兩座城堡，其間有個美麗的庭院。沿牆有條走廊，其間有數個小房間。由於地勢關係，小房間地面與兩間大屋宇的閣樓一般高低。山腳與山上通過兩個階梯相通，還有一個帶庭院

的教學區和正門。正門處有幾間辦公室。再向上走，又有幾間供教師職員使用的寬適房間。正門前面，還有一座封閉式的極大庭院。整個庭院可容納四十名教士，而且居住條件十分舒適，因為除了四個教學區外，上面還有十九個房間、兩個大廳、兩間教室和一間極大的藥房。下面還有另外七個房間和十分舒適的辦公室。范禮安視察員還決定再建一間新飯廳，因為目前使用的飯堂是借來的。如果需要的話，我們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建更多的設施。⁽¹³⁷⁾

這間學院內設四個班，一個250多位學生的讀寫班，一個文法班，一個人文學班，一個倫理學班。不久，又增設藝術班。⁽¹³⁸⁾ 該院還設有圖書館、印刷所、診所、藥房、天文觀察臺、禮拜堂



◁1635年澳門要塞圖聖保祿學院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之聖保祿學院

及廚房、食堂等。⁽¹³⁹⁾ 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還介紹，在17世紀中葉在聖保祿學院內還創辦了一所日本神學院和一所繪畫學校。⁽¹⁴⁰⁾ 學院與聖保祿教堂連成一片，組成一規模宏大的公共建築群。

明代在澳門城內還興建了一批工廠，一般多是手工作坊，但也有個別工廠已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如澳門的鑄炮廠：

澳門具有世界一流的銅、鐵炮廠，銅炮廠開始很早，而鐵炮廠則是在果阿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的命令下開辦的。⁽¹⁴¹⁾

據《澳門界務說帖》：

1557年，中國政府方准葡人建設工廠於該島之東。此為葡人在澳實行建築之始。⁽¹⁴²⁾

1557年就在澳門建工廠，可見葡人剛正式入居澳門就開始建設工廠，而最早就是鑄炮廠。該廠建於西望洋山半山間，1625年時，由兩位西班牙人管理，到第二年開始由曼努埃爾·迪亞斯·波加勞管理，即著名的“波加勞鑄炮廠”。⁽¹⁴³⁾ 至明末時，澳門鑄炮廠已發展有相當規模。據施白蒂書，1642年時，澳門表示對葡國新國王的效忠，一次運去澳門所造銅炮達二百尊；據博克塞記錄，由於荷蘭人在麻六甲海峽的阻撓，1643年，澳門波加勞鑄炮廠生產的大炮不斷積壓至數百門。⁽¹⁴⁴⁾ 足見當時澳門鑄炮廠的規模。該廠不僅有葡人鑄炮工匠，還有粵中工匠來該鑄炮廠，所鑄火炮，頗有影響。⁽¹⁴⁵⁾ 當時荷蘭人亦稱：“澳門每年都製造大量的銅或其他金屬的優質大炮。”⁽¹⁴⁶⁾

早期澳門除了鑄炮廠外，還有位於燒灰爐的石灰工廠，福建人開辦的織造工廠，各種玻璃鏡、自鳴鐘及莢文席生產工廠、印刷廠及專門生產刺繡畫像的作坊⁽¹⁴⁷⁾，即屈大均言，生產“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¹⁴⁸⁾。前引陳吾德疏草

“百工技藝，趨者如市”⁽¹⁴⁹⁾ 應是當時澳門工廠生產很準確的概括。

一座座西式教堂的出現，一幢幢西洋風格公共建物的完成，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西洋式民居，一座完全歐化的城市出現在大明帝國的南海之濱。1601年曾到過澳門的荷蘭人范·納克(J. Van Neck)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城市，遍佈西班牙風格的建築。山頂上矗立着一個葡萄牙教堂，教堂頂端有一個巨大的藍色十字架。⁽¹⁵⁰⁾

據科斯塔《澳門建築史》引當時澳門土生教士保羅·德·特林達德記載，在1630年，澳門是（僅次於果阿）葡萄牙在東方的第二大城市，有許多豪華的建築和住宅，寬闊的院落和大菜園。⁽¹⁵¹⁾ 1640年到過澳門的卡爾丹神父亦說：

澳門是一座建築優美的城市，因商貿和日夜繁忙的交通而十分富裕。⁽¹⁵²⁾

從目前保存的一幅應是作於16世紀後期的澳門城市圖，為狄奧多·德·布里(1547-1598)在所作。圖中反映了16世紀後期澳門城市的真實狀況，島上約有數百幢高低不同的西洋建築物，高者約三層，矮者為二層，多為磚瓦加木板之倉房結構。建築形狀一般為“人”字型屋頂，教堂或鐘樓則為尖頂，亦有圓椎尖頂，亦有五角、六角之尖頂。圖中有縱橫交錯的街道，行走着抬轎的、騎馬的及撐着陽傘走路的西洋人。⁽¹⁵³⁾ 從這幅圖看，當時的澳門城市建設已初具規模。

再從保存在博卡羅《要塞圖冊》中被白樂嘉(J. M. Braga)認為是繪於1632年的澳門城市圖看，明顯較上引16世紀後期的澳門圖不同，房屋建築成區成片，公共建築規模擴大，各種軍事防禦設施已基本完成，城市格局亦大大擴充（參見附圖3）。⁽¹⁵⁴⁾ 可以表明，到這時，澳門城市的發展已完全成熟。故時人稱澳門“高棟飛甍，櫛比



《澳門記略》之媽閣廟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媽閣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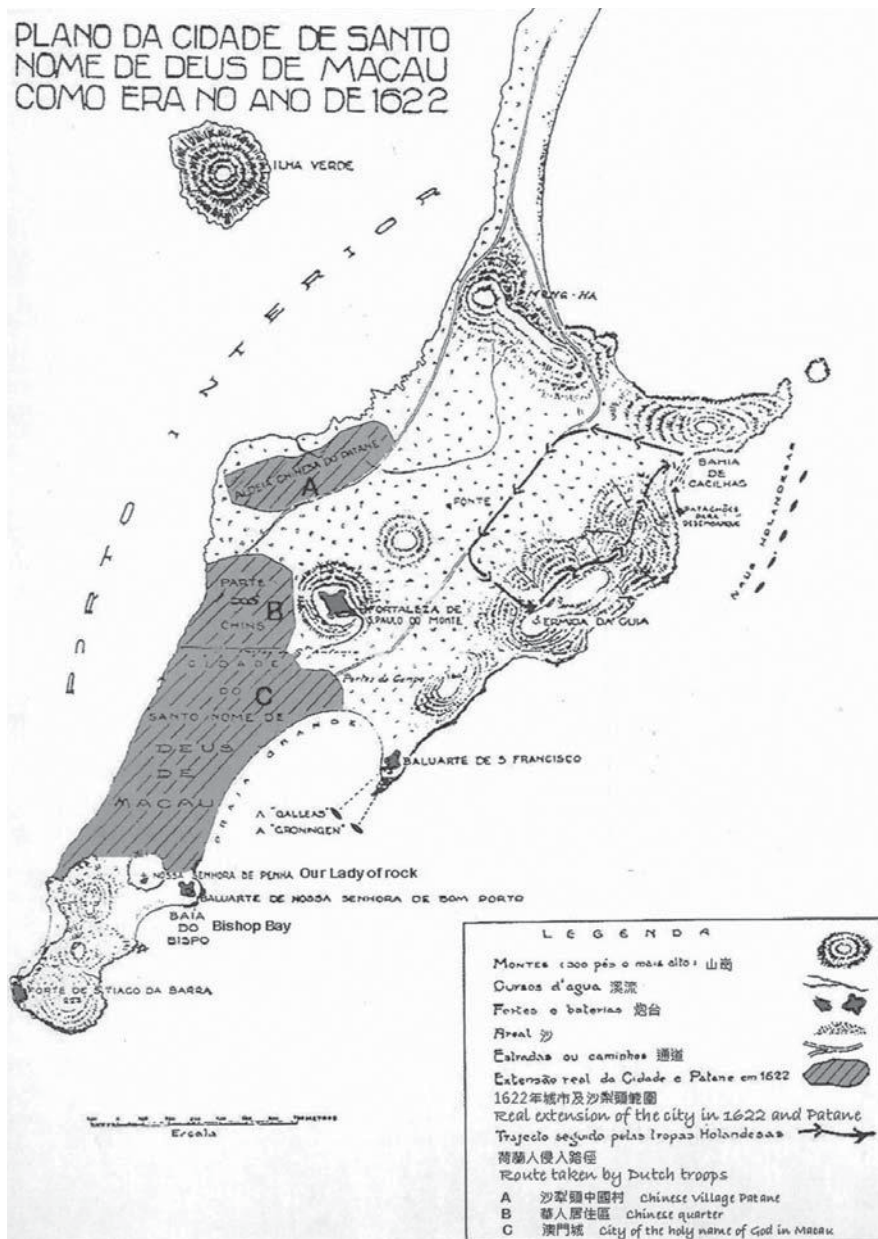
1740年代澳門屏風圖媽閣廟

明代澳城的公共建築除了西人所描繪的具有西洋風格的建築物外，還有一部分中國式的公共建築物，主要是明朝官方在澳門的行政衙署和祠廟。雖然數量不多，但頗具特色：

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¹⁵⁸⁾

相望”⁽¹⁵⁵⁾，成“雄然巨鎮”⁽¹⁵⁶⁾。屈大均則稱澳門建築“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¹⁵⁷⁾。這些中文資料與早期澳門城市圖中表現的實況完全相合，反映了明朝時期澳門城市公共建築及民居的宏偉氣勢與多姿多彩。

從這一條材料即可看出，明朝在澳門城至少建有三座政府機構，即提調衙署、備倭衙署和巡緝衙署。這三座衙署明時位於何處，今已無考。唯1665年〈澳門平面圖〉中在澳門中心區即標署為仁慈堂大樓背後的一處建築物為“官署”⁽¹⁵⁹⁾，余疑即守澳官之“官署”，又稱“提調衙門”；或者是提調、備倭、巡緝三衙署之合署辦公處。



1622年澳門平面圖之沙梨頭村

明代澳城之內還有兩座華人的公共建築群，一為澳門東南海角的媽祖廟，一為沙梨頭的永福古社。媽祖廟，又名天妃廟，該廟始建於何時今已不可考。1564年時曾有明朝軍官下澳與葡人協商剿盜，就提在澳門“村落的端點，面對大海的廟”⁽¹⁶⁰⁾，這座廟就應該是媽閣廟；1581年到澳門

的利瑪竇也稱澳門那裡敬奉着一座廟宇，叫“*Ama*”，因此稱此地為“*Amacao*”，在我們的語言中，意即“阿媽港”。⁽¹⁶¹⁾可知，該廟建築應起於1564年前。根據考古，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由澳門德字街華商又捐資建媽閣廟之“神山第一亭”。⁽¹⁶²⁾

據1622年〈澳門市平面圖〉，在澳門半島西北部沙梨頭地方標出了“沙梨頭中國村（Chinese Village Patane）”⁽¹⁶³⁾一名，可知，在明天啟二年（1622）前，華人已在沙梨頭建村。

又據〈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誌〉，則知永福古社建於明季。⁽¹⁶⁴⁾明代澳門城內華人之公共建築有確切資料者尚有一“中國寶塔”。龍思泰書提到在西望洋山腳下有一座“古老的中國塔”⁽¹⁶⁵⁾，1665年《澳門平面圖》在今

媽閣廟與下環街之間標有一處“中國寶塔”⁽¹⁶⁶⁾。此塔建於何時，具何規模，均不可考。至於建於明代的蓮峰廟及觀音堂等均在望廈村內，當時俱在澳城之外，故不在此論列。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後期澳門葡人開始了對青洲的開發。焦祈年〈巡視澳門記〉稱：



《澳門記略》之青洲



雍正《廣東通志·澳門圖》之青洲

青洲，草木蓊鬱，有亭榭廊宇，土人指為鬼子園囿。⁽¹⁶⁷⁾

吳歷《三巴集》亦稱：

青洲多翠木，為納涼沐浴之所。⁽¹⁶⁸⁾

屈大均《廣東新語》亦稱：

青洲，林木芊森，桃柳檳榔之中為樓榭，差有異至。⁽¹⁶⁹⁾

今保存在《澳門記略》中的青洲山圖，島上有完全中國古園林式的建築⁽¹⁷⁰⁾，可以反映這一時期澳門城市建設，明顯接受了部分中國傳統的建築方法（大三巴牌坊建築浮雕出自中國工匠之

手亦是一例)，以中西融合互補的方式來完善其建築藝術。

澳門城垣及堡壘的廢置

葡萄牙學者科斯塔稱：“如果16世紀是建造第一批教堂的世紀，那麼17世紀則可以稱之為炮臺的時代，其中一些炮臺還與新的教堂建在一起，大部份炮臺是從1622年起是在原來構築的第一道防線的幾個堡壘的地方建立的，當時澳門已有一道土坯城垣。”⁽¹⁷¹⁾ 澳門城垣的建築始於何時？各種文獻記載均無確切時間。據張維華先生的研究，澳門築城“似自1607年始，而防禦工事之完備，似在1622年”。⁽¹⁷²⁾ 此說並不確切，祝准《香山縣誌》：

澳城之建，年月無確證，諸書所載，大率在嘉靖時。⁽¹⁷³⁾

祝氏所言大抵是指嘉靖時澳門即已開始築城防禦，此說頗有道理，葉權嘉靖末遊澳門即稱澳門為“雄然巨鎮”⁽¹⁷⁴⁾，當是在澳門見過城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載：“1568年（隆慶二年），經中國駐澳門官員同意，特裡斯佟·瓦斯·達·維依加艦隊司令下令在 Chunambo 建起第一道城牆。”⁽¹⁷⁵⁾ 據福魯圖奧佐《懷念故土（第二篇手稿）》載：

1568年，由於中國海盜侵擾澳門，特裡斯佟·瓦斯下令在澳門建一道土坯圍牆。他把葡萄牙人組成每五人或每六人一組，編成二十個連隊，每個連隊建一段土牆。在十六天中，完成了二百七十一英尋長的土牆。葡萄牙國王們後來在那一帶的許多城堡和城牆就是從這裡開始的。⁽¹⁷⁶⁾

隆慶二年與嘉靖末僅一年之差，可知澳門築城之始最準確的說法是嘉隆之間。故陳吾德隆慶三年（1569）上疏時言⁽¹⁷⁷⁾：

佛郎機、滿刺加諸夷，性之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乃開濠鏡諸澳以處之，至乃結廬城守，據險負隅。⁽¹⁷⁸⁾

“結廬城守”則可明確證明，在隆慶三年（1569）之前，澳門葡人已經開始築城，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然而，在繪於1589年之前的〈澳門城市圖〉中，我們基本看不到一堵城牆（但在城市的北端似乎還保留着一小段城牆的殘留），亦看不到一座炮臺堡壘（參見附圖2）。⁽¹⁷⁹⁾ 在1582年，呂宋總督桑德（Francisco de Sande）的報告中亦說：

澳門至今沒有武器與防禦工事。（……）僅有五百間房舍與一位葡萄牙總督和主教在那裡。⁽¹⁸⁰⁾

1568年築城時葡人就擔心中國人不會看好，前引《懷念故土》稱：

他很想把這項工程幹完，但又想到中國官員對他們建成城堡不會好眼相看，……還是先停止施工。⁽¹⁸¹⁾

據此推論，嘉隆之時澳門築起的城牆可能被明政府派人拆毀。明人陳吾德云：

往歲總督俞大猷調諸夷剿平叛卒，許免抽分一年。至期，夷眾負功不服抽稅，此其負信在我，毋怪其然。然（海道）副使莫抑因而舍之，下令嚴戢，官兵把截，船不得通，路不得達，夷遂困服。⁽¹⁸²⁾

此事發生在隆慶三年之前，之後，明政府又下令對澳門嚴加管理，“各處把海澳官兵嚴戢百工商賈，遇有闖出，多方設法偵捕。緝獲略賣男婦一



席爾瓦約繪於1607澳門圖

口者，官縣重賞”⁽¹⁸³⁾。在這種情況下，澳葡所築城牆很可能就被入澳之明軍拆毀，故在16世紀末時的澳門圖上僅留有城牆的殘垣。

澳門再次築城乃源起於對荷蘭人的防禦。1601年9月，荷蘭人有兩艘貿易船進入澳門，其中有部分水手被扣留，並將其十七人當作海盜處以死刑，導致葡荷結怨。1602年，荷蘭人在麻六甲海峽截擊澳門船，1603年，葡船“聖卡塔利娜”號再次被劫，1604年6月，荷蘭海軍上將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yck）率領艦隊進逼澳門。⁽¹⁸⁴⁾在荷蘭人的威脅之下，澳門葡人再次修築城牆，以保衛澳門。《明神宗實錄》：

萬曆三十三年（1605），（澳夷）私築城垣，官兵詰問，輒被倭抗殺。⁽¹⁸⁵⁾

“私築”，即表明這次築城是未經明朝政府同意的。《萬曆野獲編》亦有記載：

丁未年（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畧夷。（……）其時，畧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還居住。⁽¹⁸⁶⁾

據路易士·達·席瓦爾約於1607年繪製的澳門地圖來看，圖中的城牆已大體建成（參見附圖77），與漢文資料時間相合。⁽¹⁸⁷⁾這一次澳城的修築很可能在張鳴岡任兩廣總督時又一次被明政府拆毀。《全邊略記》：

（萬曆四十三年）十月，粵督張鳴崗奏，粵海旦夕以濠鏡澳夷為兢兢，多蓄奴以為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啟元躬視澳中，宣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掛帆矣。夷目咩吵哪（João Serrão da Cunha，為當時澳門兵頭）等，立狀為之永禁。⁽¹⁸⁸⁾



1635年澳門要塞圖

既然可以入澳將“私築城垣”的倭奴“押送出境”，又稱“數十年澳中之患，一旦祛除”⁽¹⁸⁹⁾，可以推論這一次“私築”的城牆應為明政府拆毀。再從萬曆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喻安性針對澳夷訂立的《海道禁約》來看，其中一款明確提出：

禁擅自興作。(……)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¹⁹⁰⁾

這很可能是在拆毀澳夷城垣後訂立的禁款，力圖以法令的形式禁止澳夷私造城垣。但是澳門葡人並沒有完全遵照執行這一禁約，1613年（萬曆四十一年）即開始修建媽閣炮臺⁽¹⁹¹⁾，1617年（萬曆四十四年）即開始興建著名的“三巴炮臺”及北部城垣⁽¹⁹²⁾。這次築城“儘管他們得不到正式的同意，但豐厚的禮物使得地方官對1622年修築一道從大炮臺往東北直到大海的城牆一事視而不

見。”⁽¹⁹³⁾到1621年荷蘭入侵澳門之前，澳門築城的速度大大加快。道光《香山縣誌》：

時徐如珂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夷日築百丈。⁽¹⁹⁴⁾

“日築百丈”，反映當時澳門為了防禦荷蘭人入侵，其築城工作步伐極快。1621-1622年間，不僅三巴炮臺還在繼續修建，而且媽閣炮臺、燒灰炮臺、嘉思欄炮臺及東、西望洋山炮臺均在修建中。⁽¹⁹⁵⁾澳門東北之城，遂於1622年完成。⁽¹⁹⁶⁾同時，青洲也修建了城堡。《皇明法傳錄續紀》載：

又於海中青山建一大樓堡。

舊年紅毛報警（指天啟二年荷蘭犯澳門），則與規畫地基，鳩工築城，名為防禦紅毛，其



實沿海一帶，並無堆土，依山為壙，屹然成建瓴之勢。⁽¹⁹⁷⁾

這一次築城之事亦遭到明政府的干涉。道光《香山縣誌》載：

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壙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冀除殆盡。⁽¹⁹⁸⁾

徐如珂署海道副使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離澳則在天啟元年（1621），這應是他在離澳前的一次對澳門的行動。上文稱“冀除殆盡”恐怕僅指青洲，並沒有將整個澳門城垣毀除。《明史·佛郎機傳》稱：

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洲城，番亦不敢拒。⁽¹⁹⁹⁾

西文資料亦稱中國官兵將青洲島上的建築物全部拆毀。1622年的荷澳之戰，那些保存下來的澳門炮臺和堡壘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荷澳之戰結束後，1623年5月，馬士加路也（Dom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出任澳門兵頭，他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澳門城牆的建設和軍事防禦體系。施白蒂稱：“他於同年（1623）7月17日就職後建起了城牆，並完善了堡壘體系。”⁽²⁰⁰⁾博卡羅則稱：“澳門市的城牆基本上是由首任總督馬士加路也完成的，他修建了這些防禦設施中的大部分。”⁽²⁰¹⁾達爾波則稱：

葡萄牙人利用於1622年被俘虜的荷蘭人以築城牆，作為防禦外來入侵。城牆起大炮臺山之東偏北，直達方濟各會修院遺址。至1626年，全部工程遂告完成。⁽²⁰²⁾

《明清史料乙編》載：

（上缺）環架大銃數十門，外望皆曰銃臺，其實中虛，非壘基也。偵者屢報夷人築城費銀二十萬，報知該國王，謂已據中朝一方地。該國王遂遣親侄名噶弗難系代具為叻嘮，賚敕前來鎮守。夷言叻嘮，即華言兵頭也。兵頭因築此垣，虛中聳外，欲規畫為殿基，後建塔，請封一王子居守，故兵頭盤踞此中，護惜城臺，每有存亡與俱之意。幸蒙本部院指受方略，首絕接濟，以扼夷之咽喉；既紮攬頭，以牽夷之心腹，官兵密佈，四面重圍，嚴拿奸黨，召回亡命；又用間用謀，挑窮夷鬼婦，與兵頭為難，浸成內變。番哨聞出，又一鼓成擒，不能得志。於是，夷始坐困，受命叩關，甘認拆城毀銃，驅奸滅哨，歲加丁糧一萬兩，編附為氓，寫立認狀在案。當督夷人攬頭役夫自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三月初四日止（下缺）。⁽²⁰³⁾

這一份檔案由於殘缺，沒有明確幾年。其中提到國王侄兒噶弗難系代具，當即1623年澳門兵頭的葡國王室貴族馬士加路也（Dom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²⁰⁴⁾，噶當即 Dom，難系代具當即 Francisco 之漢譯。其中又提到“又用間用謀，挑窮夷鬼婦，與兵頭為難，浸成內變”，正是《歷史上的澳門》一書所記：

他不斷威脅恫嚇群眾，特別是他見到別人的老婆、女兒就追，嚇得婦女們都不敢去做彌撒。他的這些行為終於在1623年引發了一場暴動，他也被人暗殺了。⁽²⁰⁵⁾

其中“甘認拆城毀銃”，則又當指天啟五年（1625）四月毀城之事。見《明熹宗實錄》卷五八：

（天啟五年四月）總督兩廣何士晉疏報，濠鏡澳夷邇來盤踞，披猖一時，文武各官決策防禦。今內奸絕濟，外夷畏服，願自毀其城，止留海濱一面以禦紅夷。⁽²⁰⁶⁾

博卡羅所載亦相脗合：

然而，中國人十分多疑，認為修建這些設施是為了對付他們的，因而迫使我们拆掉了朝陸那一邊自三巴炮臺起的大部分防禦設施。結果，祇有大海對面、城堡西邊以及薩西利亞斯海濱狹長地帶的設施保留下來。⁽²⁰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馬士加路也出任澳督後，澳門的城牆及軍事防禦體系已基本完成。上引明檔中所言“虛中聳外，欲規劃為殿基，後建塔，請封一王子居守，故兵頭盤踞此中”，又“環架大銃數十門”的銃臺，考諸當時之澳門城圖，則非三巴炮臺莫屬。可知，三巴炮臺在當時不僅是澳門之一軍事要塞，而且為澳督居留之地。檔中稱“夷人費銀二十萬兩”，反映這一次築城規模不小。據博卡羅介紹：

這些城牆高度為2英尋，到胸牆地段厚度祇有八拏（即指尺）。此外，由於地面不平，城牆的高度隨上下坡的變化而不同。這些城牆也是以泥土與石灰或稻草混合而成，整個城牆被壘在一起，因而特別堅固。⁽²⁰⁸⁾

天啟五年（1625），在兩廣總督何士晉的強力干涉下，其北部城牆（即應包三巴炮臺在內）全部拆毀，但保留東南濱海一帶城牆。故《澳門記略》稱：

澳城固而庫，明所毀餘也，今在聚廬中，於西北圍牆不相屬。⁽²⁰⁹⁾

北部城牆被拆毀後，澳葡並未完全放棄。不到五年，澳葡再次提出復築城臺。《崇禎長編》卷四一載：

〔崇禎三年（1603）十二月〕丙辰，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彝人擅築城臺，曩用大炮臨之，拆不及半。今要脅曰：必復築城臺而三百人始肯應調。（……）仍申諭澳中，城臺永不許復築。⁽²¹⁰⁾

雖然明政府明令“不許復築”，但澳葡政權並沒有聽命。從繪於1632年的〈澳門要塞圖〉看，澳門北部城牆及炮臺已經復築完成。從這張圖上看得很清楚：當時澳城西起海邊至沙梨頭，在沙梨頭建炮臺一座；復稍南至三巴寺，在三巴寺東高地上建頗具規模的三巴炮臺，從圖上看就標出炮位十一門；復向西至山頂，在水坑尾城門上建聖若奧堡壘，又在山頂建聖耶羅尼炮臺；又在聖耶羅尼炮臺的北面東望洋山上建炮臺；城牆從聖耶羅尼炮臺復南折沿海濱至嘉思欄炮臺，復南折至西望洋炮臺、燒灰爐炮臺，最後至媽閣炮臺。並在東望洋北麓海濱建一城垣。⁽²¹¹⁾ 1665年〈澳門城平面圖〉所繪城牆、炮臺與1632年〈澳門平面圖〉完全一致⁽²¹²⁾，可見，到明崇禎時整個澳門城除西部內港外，北部、東部及南部均建有城牆，並於諸要塞處建置炮臺，使澳門城成為一座在軍事上防範甚為嚴密的城堡。

明代時，澳門城建有四個城門。《澳門記略》稱：

大門一，曰三巴門；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曰花王廟門。⁽²¹³⁾

很明顯，這四個門均設在北部城牆，主要是為了方便同北部中國內地進行交往而設。到後來，三小門俱塞，僅三巴一門為出入之口，俱因海禁及清王朝對澳門嚴加控管之故。直至道光時，方開水坑尾門和新開門，以方便澳門與內地交往。⁽²¹⁴⁾

至於澳門之炮臺，諸書多有記載，據《澳門記略》、薛蘊《壘門記》、陸希言《壘門記》及暴煜《香山縣誌》諸書均稱當時澳門有六座炮臺：

三巴炮臺，又稱大炮臺、漫地炮臺 (Fortaleza do Monte)、聖保祿炮臺 (Fortaleza de São Paulo do Monte)。1617年開始興建，耗時十年，至1626年年全部完工。⁽²¹⁵⁾ 該炮臺是澳門最大的炮臺。炮臺位於一小山丘頂，成正方形城圍，城圍中部為一座三層樓房，

每一層均架設大炮，共分佈十八門青銅榴彈炮。該炮臺早期一直作為澳門兵頭居所，直至18世紀。⁽²¹⁶⁾

東望洋炮臺，又稱基亞炮臺 (Fortalez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位於澳門最高點東望洋山上。該炮臺始建於1622年。⁽²¹⁷⁾ 據博卡羅稱，



1635年澳門要塞圖大炮臺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大炮臺



三巴炮臺遺址

當時明朝“同意以七千銀幣的酬金”拆除這座炮臺。⁽²¹⁸⁾ 這就是說，在1635年之前該炮臺已被拆除。但據今保存的該炮臺碑誌稱：“此炮臺乃由澳門市民出資興建，炮兵頭是安多尼·黎伯祿。始建於1637年9月，而完成於1638年3月。”⁽²¹⁹⁾ 可見是拆毀後重建。炮臺面積約八百平方米，臺牆高6米，建有塔樓4座，安置大炮五門。

西望洋炮臺，又名竹仔室炮臺，西人稱佛蘭姍聖母炮臺（Forte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在1622年馬士加路也的建炮臺防衛計畫中有西望洋炮臺。⁽²²⁰⁾ 該炮臺禦1626年建成，當時架設兩門青銅炮。⁽²²¹⁾



1635年澳門要塞圖西望洋炮臺



1635年澳門要塞圖東望洋炮臺



約康熙十八年繪澳門圖西望洋炮臺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東望洋炮臺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西望洋炮臺

媽閣炮臺，又稱娘媽角炮臺、罷辣炮臺 (Fortaleza da Barra)，還稱聖地牙哥炮臺 (Fortaleza de S. Tiago da Barra)。1612年即已開始興建，1622年荷人進攻澳門時，該處即架設一尊大炮。1623年，馬士加路也加緊擴建該炮臺，1629年建成一座長150米、寬50米甚為壯觀的炮臺。炮臺內建一水塘，可蓄水3000噸，共架炮十八位。⁽²²²⁾



1635年澳門要塞圖媽閣炮臺



《澳門記略·側面澳門圖》媽閣炮臺

燒灰爐炮臺，又名南環炮臺、蓬巴而底臺 (Fortaleza de Nossa Senhora do Bomparto)，還有一別名“聖母炮臺”。1622年建成，荷人襲澳時，該炮臺發揮作用。炮臺呈三角形，當時置有八門大炮。⁽²²³⁾



1635年澳門要塞圖南環炮臺



約康熙十八年繪澳門圖南環炮臺



《澳門記略·側面澳門圖》燒灰爐炮臺



《澳門記略·正面澳門圖》嘉思欄炮臺

嘉思欄炮臺，又稱噶斯蘭炮臺、法蘭濟斯炮臺 (Fortaleza de S. Francisco)，還稱聖方濟各炮臺。該炮臺呈橢圓形，1622年荷澳戰爭中即已存在，重建於1629年，共設有七門炮。⁽²²⁴⁾

除了上述六座諸書均有記載的炮臺外，還有幾座炮臺不知何故未見於上述諸書。博卡羅《要塞圖冊》與閔明我 (D. F. Navarrete)《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二書中均稱澳門有八座炮臺⁽²²⁶⁾，比上述諸書記載多出兩座。1632年〈澳門平面圖〉及1665年〈澳門平面圖〉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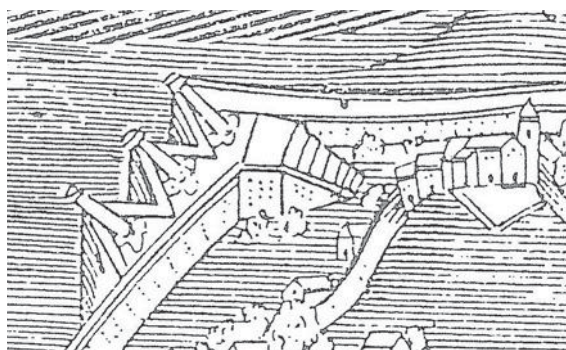
標出了十座和九座炮臺⁽²²⁷⁾，則1632年〈澳門平面圖〉比諸書要多出四座炮臺。

其一是在沙梨頭處建有炮臺，當即沙梨頭炮臺，又稱聖若奧炮臺。郭永亮言，該炮臺“為澳門最古的炮臺之一，但其建築年代不可考”⁽²²⁸⁾。據《澳門編年史》：“1562年，第一座教堂——聖安東尼奧小教堂以居民點之門為要塞，置以火炮(沙梨頭要塞)。”⁽²²⁹⁾可知沙梨頭炮臺應是澳門最早建立的炮臺。據圖則可知該炮臺至1632年前，共架炮三門，是澳門較小的炮臺之一。⁽²³⁰⁾

其二是聖伯多祿小炮臺 (Forte de S. Pedro) 1626年建成，位於南灣街中部。該炮臺很小，剛建成時僅大炮三門，到1635年時僅設大炮兩門⁽²³¹⁾，



1635年澳門要塞圖嘉思欄炮臺



1632年澳門要塞圖中的沙梨頭炮臺

1632年《澳門平面圖》沒有繪聖伯多祿炮臺，但1665年《澳門平面圖》卻繪了這一炮臺。

其三是聖若奧城堡，郭永亮稱聖若翰城堡築於“水坑閘門”牆上，城堡置有五門大炮。⁽²³²⁾ 1632年《澳門平面圖》上有“聖若奧城堡”，1665年《澳門平面圖》亦標出“聖若奧城堡”，但未繪出炮位。⁽²³³⁾

其四是聖耶羅尼炮臺，又稱“仁伯爵炮臺”，即今山頂醫院出。郭永亮稱該炮臺建築年代與澳城同年，亦即是澳城最後完成時，該炮臺亦建築完工。⁽²³⁴⁾ 1632年《澳門平面圖》亦標出“聖耶羅尼炮臺”。⁽²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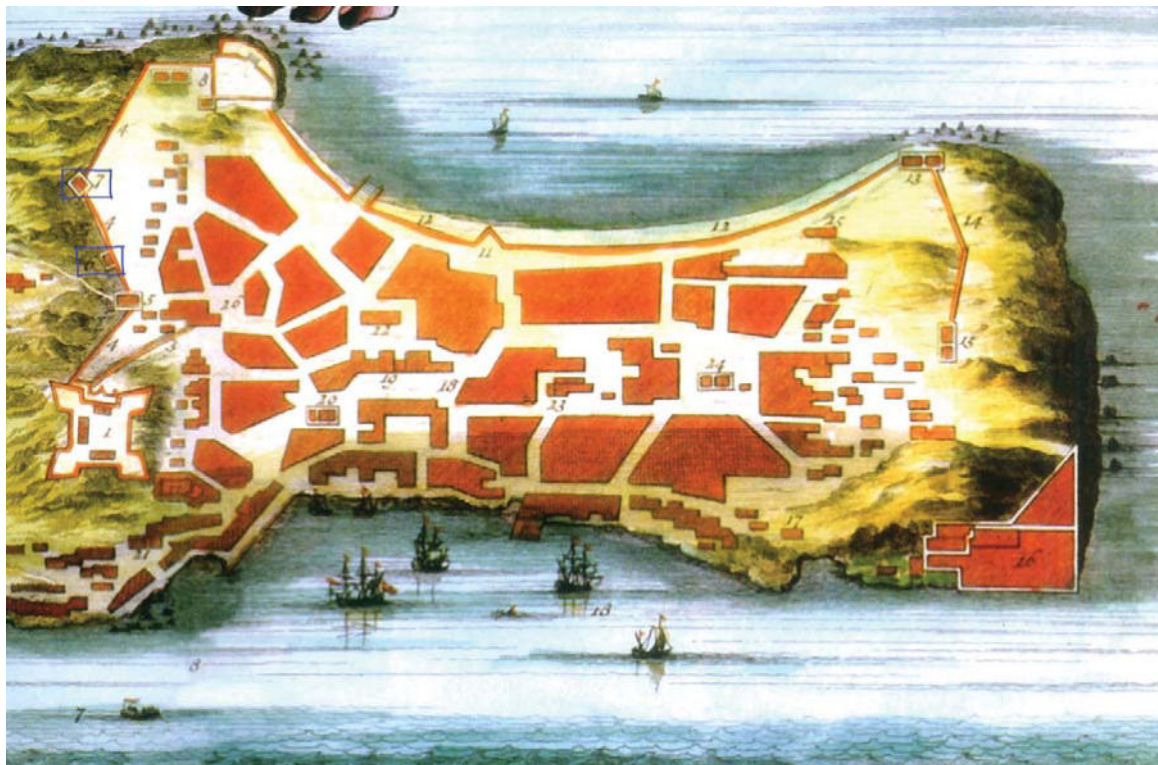
還有一處炮臺，僅見於1632年《澳門平面圖》中，該圖在澳門內港沙欄仔海旁處繪有一炮臺，炮臺架炮兩門，但這一炮臺在其他任何文獻中均無記載，就連從1665年《澳門平面圖》對此炮臺亦無標署。薛鳳旋先生標此處炮臺為“銀坑炮臺”，實誤。⁽²³⁶⁾ 銀坑在澳門半島對面灣仔處，並不在澳門半島。郭永亮亦稱：“銀坑炮臺

在內港對面銀坑島，與沙梨頭互為對峙。”⁽²³⁷⁾ 銀坑確實建有一座炮臺，但建築時間應在1645年以後，在1655年荷蘭人豪斯伯格的地圖上，灣仔之銀坑標有一處葡萄牙炮臺⁽²³⁸⁾。但這一炮臺並非澳門半島上的沙欄仔炮臺。

綜上所述，可知明代在澳門修建的炮臺總數為十一座，但常見的大炮臺為六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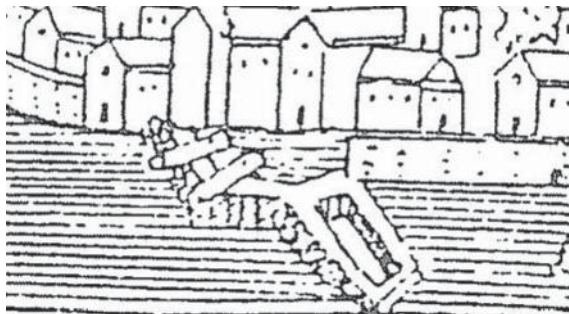
1635年澳門要塞圖



1665年澳門平面圖 (6) (下) 聖約翰堡壘，(7) (上) 聖耶羅尼炮臺，(22) 中國官署

明代修建澳門炮臺之時間及炮位設置 ⁽²³⁹⁾

炮臺名	修建時間	《要塞圖冊》	《澳門記略》	《廣東海防匯覽》
三巴	1626	18門	28門	47門
東望洋	1638	5門	7門	20門
西望洋	1626	2門	5門	13門
媽閣	1629	18門	26門	29門
嘉思欄	1629	7門	7門	18門
南環(灣)	1622	6門	3門	5門
小炮臺	1626	3門	無	無
沙梨頭	1562	2門	無	無
聖若奧	1632	5門	無	無
聖耶羅尼	1632	1門	無	無
沙欄仔	1632	2門	無	無



1632年澳門要塞圖中的沙欄仔海傍炮臺

明代澳門城牆和炮臺的建設經過幾建幾拆的過程，但最終仍在西元1632年（崇禎六年）之前全部工程完成。很可能是明王朝北部邊疆形勢日漸危殆，明政府無暇顧及澳門築城建臺之事；亦可能是明政府準備同澳葡合作，考慮到荷蘭人東來入侵澳門的危險，而同意澳門葡人重建城牆及炮臺。總之，在1632年澳門城牆及炮臺重建完工之後，直至明朝滅亡，雙方再也沒有發生過拆建城垣的爭執。

【註】

- (1) Liam Maethew Brockey, *Portuguese Colonial Citi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shgate, 2008, p. 1.
- (2) (葡)若爾熱·曼努埃爾·弗洛雷斯〈澳門16-17世紀歷史：正在進行之某些考察〉，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 (3) (明)郭秉《廣東通志》卷69〈外志·番夷〉。
- (4)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頁100。
- (5) (明)俞大猷《正氣堂全集》卷15〈論夷商不得恃功恣橫〉，頁383。
- (6)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頁65。
- (7) (9) (明)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1〈撫處濠鏡澳夷疏〉。
- (8) (葡)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遊記》下冊，第221章，頁698。
- (10) (明)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頁44。
- (11)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5、16。
- (12) (18)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o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R.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15; p. 14.



- (13)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7。
- (14) (明)龐尚鵬《百可亭稿稿》卷1〈撫處濠鏡澳夷疏〉。
- (15) (明)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342〈吳司馬奏議〉卷1〈議阻澳夷進貢疏〉。
- (16) (葡)馬若龍：〈澳門——中葡交匯之城竣工〉，載《梁披云先生九五華誕紀念文集》，澳門文化研究會，2001年。
- (17) (葡)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頁76。
- (19) (清)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 (20) (明)郭尚賓《郭給諫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頁11-12。
- (21) J. M. Braga, *Macau: A Short Handbook*. 轉引自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頁11。
- (22) (明)郭棐《廣東通志》卷69〈外志·番夷〉。
- (23) 媽閣廟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四街重修”，上款為“萬曆乙巳歲”，下款為“仲夏吉日立”，見陳樹榮〈澳門媽祖文化的形成及發展——重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談起〉，載《媽祖文化研究》，頁35-53，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出版，2005年。
- (24) 譚世寶〈澳門媽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文化雜誌》第29期，1996年。
- (25) (清)釋跡刪《咸陟堂詩文集》之詩集卷14〈三巴寺〉，清康熙刻本。
- (26) (明)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10〈藩省志〉10“秩官”。
- (27) 王文達《澳門掌故》之〈澳城記〉丙“澳城擴展經過”，頁14。
- (28)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7。
- (29) 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澳門聖堂史略〉，頁18。
- (30) (明)王以寧《東粵疏草》卷1〈請蠲稅疏〉。
- (31) (明)王以寧《東粵疏草》卷5〈條陳海防疏〉。
- (32)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24。
- (33) (34) (38) (葡)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 (35) 王文達《澳門掌故》之7〈大三巴牌坊詳考〉，頁95。
- (36) (39) 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外關係史叢》第5輯博克塞〈16-17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的轉港之作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頁85；頁91。
- (37) (明)田生金《按粵疏稿》卷6〈辨問矜疑罪囚疏〉。
- (40) 林永勝〈澳門前地空間〉，載澳門《文化雜誌》第53期，2004年。
- (41) (荷)狄奧多·德·布里〈澳門城市圖〉，載《文化雜誌》第26期，1996年。
- (42) 雷曾德(P. Barreto de Resende)〈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白樂嘉認為，該圖成於1632年，見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 28.
- (43) 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isa, 1608-1667*, vol. 3, Nendeln: Kraus Reprint Ltd, 1967, pp. 265-266.
- (44) (葡)愛雷迪(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29期，1996年。
- (45)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附圖“1626年澳門圖”，頁19。
- (46) (葡)阿爾傑門·里卡契夫〈早期澳門地圖(1665年)〉，原載《約翰·文彭士地圖集》之手繪圖，見《文化雜誌》第13、14合刊，1993年。
- (47) (葡)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1章“地租”第98-99頁中介紹了市政廳內保存的1689年的五本交租人員登記冊。
- (48) 雷曾德(P. Barreto de Resende)〈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白樂嘉認為，該圖成於1632年，見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 28.
- (49) (53)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ó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R.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14; p. 15.
- (50)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頁100。
- (51) (52) (明)王臨亨《粵劍篇》卷3〈志外夷〉，頁93；頁103。
- (54) 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日漸茁壯的澳門華人地方教會〉，頁9。又(清)汪楫《崇禎長編》卷24：“(崇禎三年五月)禮科給事中盧兆龍：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粵之盜賊亡命，投倚為患者，不可數。”崇禎三年為1630年，當時聚居澳門的閩粵之人就有如此之數，可證所言不虛。
- (55) (57) 乾隆〈重修三街會館碑記〉，載王文達《澳門掌故》之11〈會館談往〉甲“三街會館”，頁237。
- (56) (明)陳吾德《謝山存稿》卷1〈條陳東粵疏〉。
- (58) *Arquivos de Macau*, 4a série, vol. 8, pp. 36-37;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23。
- (59) (葡)羅理路著，陳用儀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12〈葛列格里奧·龔薩雷斯神父給胡安·德·波爾哈的信〉，頁140。
- (60) (荷)狄奧多·德·布里〈澳門城市圖〉，載《文化雜誌》第26期，1996年。又參見徐新〈荷蘭畫家筆下的澳門——16至17世紀兩幅銅版畫考證〉，載《澳門日報》1997年10月12日。



- (61) (葡) 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週年》，澳門主教公署，1964年，頁11。
- (62) Pe. Montanha, “Apparatos para a Historia do Bispado de Macau”, in Maria Regina Vale, *Igrejas de Macau*, p. 14.
- (63) (96)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5章“澳門早期教堂”，頁46；頁47。
- (64) 原圖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歷史地圖精選》，頁36-37，華文出版社，2000年。
- (65) (68) (89) (97) (102) 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澳門聖堂史略〉，頁18；頁19；頁18；頁17；頁17。
- (66) (69) (73) (77) (81) (85) (101)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5章“澳門早期教堂”，頁68；頁63；頁63；頁68、46、63；頁66；頁66；頁44。
- (67) 原圖載(清) 郝玉麟：《(雍正) 廣東通志》卷3〈澳門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70)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Macau, As Ruínas de S. Paulo: Um Monumento para o Futuro*, p. 54,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 (71)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150-151。
- (72) (葡) 羅理路著，陳用儀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12〈葛列格里奧·龔薩雷斯神父給胡安·德·波爾哈的信〉，頁140。
- (74) (明) 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342《吳司馬奏議》卷1〈議阻澳夷進貢疏〉。
- (75) (明) 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頁45。
- (76) (79) (83) (87) (91)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0。
- (78) 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士在亞洲》Cod. 49-IV-59, f184; 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7-8.
- (80)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150。
- (82)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56, pp. 406, 451.
- (84)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50。
- (86)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38; 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第1650號鈔件，頁91-92。
- (88)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50。
- (90) (98) (葡)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24；頁18。
- (92) (意) 利瑪竇著，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附錄“羅明堅神父致麥爾古裡亞諾神父書”，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頁431。
- (93) (葡) 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3期，1998年。
- (94)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50。
- (95) (清) 祝准《新修香山縣志》卷4〈海防〉。
- (99)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書後附“正面澳門圖”將大廟標在澳之東南，而另一幅〈側面澳門圖〉則在三巴堂緊連處標“大廟”(參見附圖17)，側面圖明顯有誤。
- (100)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2冊〈兩廣總督吳熊光等奏澳門船尚未退去遵旨用兵驅逐未即攻剿情形並將澳門繪圖貼說呈覽奏〉。
- (103) 原圖載葡萄牙東方藝術博物館藏〈澳門屏風圖〉，林廣志先生拍攝提供。
- (104) (葡) 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週年》，頁11。
- (105) Manuel Teixeira, “The Church in Macau”, in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by R.D. Cremer, HongKong: UEA Press Ltd., 1987, p. 42.
- (106) (葡)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3、26。
- (107) (明) 湯顯祖《牡丹亭》第21齣〈謁遇〉，人民文學出版社標點本，1993年。
- (108) 費爾南·格雷羅神父〈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載澳門《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此外參見王文達《澳門掌故》之7〈大三巴牌坊詳考〉，頁59；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p. 14-15.
- (109) (清)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21〈香山巒〉引龔翔麟“珠江奉使記”。
- (110)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149。
- (111) 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isa, 1608-1667*, vol. 3, Nendeln: Kraus Reprint Ltd, 1967, pp. 162-163.
- (112)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149。
- (113) 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澳門教區大事編年紀錄〉，頁51。
- (114)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頁82。
- (115)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271.
- (116) *Ta-Ssi-Yang-Kuo*, Série I, Vol. 1, p. 162. 東望洋山炮臺與教堂興建同時。據文德泉書引首任澳督馬士加路也信函稱，1623年到澳門時，東西望洋山炮臺都已具備雛形。



- 轉引自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5章“澳門早期教堂”，頁69。
- (117)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483-484;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頁27。
- (118) (葡)康索丁(Tomás Taveira Consortium)、卡拉多(Maria Calado)、門德斯(Maria Clara Mendes)：〈澳門從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市建設方面的發展〉，載《文化雜誌》第36、37期合刊，1998年。
- (119)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第30頁收錄了特奧多雷·布里的這幅圖，稱之為1590年代《澳門城》，其時該圖進行重新繪製，並清晰地標出途中主要建築物名字，這一工作十分有意義。但遺憾的是薛氏的標注完全錯誤。他將議事亭標在了板樟堂的位置。
- (120)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附〈議事亭圖〉，頁218-219。
- (121) (清)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6〈宦績·王綽傳〉。
- (122)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153。
- (123) 文德泉轉引自金豐居士〈議事會大樓，大將登臺氣象萬千〉，載《新報》2009年7月9日。
- (124) (127)(130)(134)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0。
- (125) Lettere dell'India Orientale, scritte da Reverend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Novamente stampate. In Vinezia, appresso Antonio Ferrari. MDLXXX, pp. 215-216, 董少新〈賈尼路與澳門〉，載《澳門雜誌》2002年8月。
- (126) (129)(132)(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150；頁151，頁150。
- (128) (葡)雷戈〈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1623)，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 (131)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5章〈澳門早期教堂〉，頁72。
- (133) (比利時)鐘鳴旦等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1冊第56種陸希言〈閩門記〉，臺北利氏學社，2009年，頁428-429。
- (135) A H M / SCM, N. 277, Microfilm AO367, 轉自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77。
- (136)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頁13-14及頁31-32。
- (137) (138) 1594年10月28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頁33-34；頁51。
- (139) 1594年11月9日范禮安在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轉引自高瀨泓一郎的《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東京八木書店，2001年，頁348-353。印刷所及藥房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頁135-136，頁142-143。
- (140) 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 (141)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ó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R.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23.
- (142) 《澳門專檔》第4冊〈澳門界務說帖〉，頁81-82。成書於嘉靖末年的《日本一覽 窮河話海》亦稱：“又聞(佛郎機夷)市銅鑄大銃。”可證1557年建廠說不虛。
- (143) 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海外委員會鈔件第79簿，參見桑托斯《鑄造專家波加勞考》，頁97，轉自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頁279；科斯塔(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
- (144)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50；C. R. Boxer, “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 1621-1647”, in *Obra Completa de Charles Ralph Boxer; Vol. I: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1, p. 109.
- (145) 霍景榮〈為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廣有工匠曾在粵中打造者，亦調二十餘人，星夜赴京。”載《徐光啟集》卷4〈練兵疏稿〉2附錄。又徐光啟《徐光啟集》卷6〈守城制器疏稿〉之“聞風憤激直獻芻蕘疏”：“緣澳中火器日與紅毛火器相鬥，是以講究越精。”
- (146) (葡)萊薩〈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
- (147) 參閱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文德泉〈澳門四百年印刷業〉，載《文化雜誌》第6期，1988年；(日)村上直次郎(日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2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頁24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李瑞祥〈澳門美術發展的四個時期〉，載《濠鏡》創刊號，1986年。
- (148)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澳門〉，頁92。
- (149) (明)陳吾德《謝山存稿》卷1〈條陳東粵疏〉。
- (150) 包樂史著，莊國土譯《中荷交往史》第3章“前往中國”，路口店出版社1989年版；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
- (151) (葡)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



- (152) (葡) 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 (153) (荷) 狄奧多·德·布里〈澳門城市圖〉，載《文化雜誌》1996年，第26期。
- (154) (葡) 雷曾德〈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白樂嘉認為，該圖成於1632年，見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Hong Kong: Graphic Press, 1960, p. 28.
- (155) (清) 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 (156) (明) 葉權《賢博編》之〈遊嶺南記〉，頁44。
- (157)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澳門〉，頁36。
- (158)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頁24。
- (159)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6-37。
- (160) (葡) 羅理路著，陳用儀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9，若奧·德·埃斯科巴爾〈評述〉（澳門，1565年），頁112。
- (161) (意) 利瑪竇、(比) 金尼閣著，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割記》第2卷第2章，頁140。原文譯作偶像。金國平稱，義大利原文為 *Pagoda*，祇能譯作廟宇，無他義。
- (162) 前引譚世寶文錄媽閣廟石壁銘文：“明萬曆己巳（三十三年）德字街眾商建。”參閱譚世寶〈澳門媽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文化雜誌》第29期，1996年。
- (163)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0。此圖為薛氏首次公佈，十分重要。
- (164) 民國十三年《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誌》稱該廟“曩自明季，以迄於茲，由嘉慶重修，久矣。”見王文達《澳門掌故》之10〈古廟小志〉甲“沙梨頭土地廟”，頁71。
- (165) (瑞典)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頁169。
- (166)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6-37。劉芳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20號檔第13-14頁記錄：道光八年（1828）澳門華人擬在新村尾地建一閣塔，這是第二次提到澳門建塔。從地理上看與明代之塔相近。余疑這新村尾擬建之塔是否是明代即已出現的“中國之塔”呢？由於時間久遠，至道光時已經坍塌，故提議重建。
- (167) (清) 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9，焦祈年〈巡視澳門記〉。
- (168) (清) 吳曆撰、章文欽箋注《吳漁山箋注》卷2〈三巴集〉前帙“澳中雜詠”，頁169，中華書局，2007年。
- (169)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澳門〉，頁36。
- (170)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附〈青洲山圖〉，頁206-207。
- (171) (葡) 科斯塔 (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35期，1998年。
- (172)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頁50。
- (173) (清) 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澳門〉，中山文獻叢書影印道光七年刊本。
- (174) (明) 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頁44。
- (175) (葡)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7。
- (176) (181) (葡) 福魯圖奧佐 (Gaspar Frutuoso) 〈懷念故土（第二篇手稿）〉，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 (177) (清) 張廷玉《明史》卷315〈陳吾德傳〉。
- (178) (明) 陳吾德《謝山存稿》卷1〈條陳東粵疏〉。
- (179) (荷) 狄奧多·德·布里〈澳門城市圖〉，載《文化雜誌》第26期，1996年。
- (180) P. Pastells, *Cata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xistentes el 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轉引自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頁253-254。
- (182) (183) (明) 陳吾德《謝山存稿》卷1〈條陳東粵疏〉。
- (184) 包樂史 (L. Blussé) 著，莊國土譯《中荷交往史》第3章“前往中國”，及科斯塔〈澳門建築史〉，載《文化雜誌》第35期，1998年。
- (185) 《明神宗實錄》卷257，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
- (186)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香山壘〉，頁785。
- (187) 路易士·達·席瓦爾〈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澳門〉，載《卡里勃萊地圖集》，見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之附圖，頁26。
- (188) (明) 方孔炤《全邊略記》卷9〈海略〉。
- (189) (明)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香山壘〉，頁786。
- (190)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頁70。
- (191) António Bocarro, *Década 13 da Historia da India*, vol. 2, Lisboa: Typ. d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1876, pp. 724-737. 記載1613年勞倫索·卡瓦略 (Lourenço Carvalho) 回復海道副使俞安性的答詞中提到：“我等萬般無奈，堅閉城門，在媽閣角修建炮臺，隨時準備保護我輩生命及船隻”。
- (192) (葡)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3頁稱三巴炮臺可能於1617年動工。
- (193) (瑞典)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頁31。
- (194) (清) 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
- (195) 1622年前後《澳門要塞圖》三巴、媽閣、燒灰爐、嘉思欄及東、西望洋炮臺均已建成，但架有炮者僅嘉思欄炮臺和燒灰爐。參閱 Faria e Sousa, *Ásia*, p. 362, 轉自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 33.
- (196) (200) (葡) 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33；頁36。



- (197) (明)高汝忬《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13〈陳熙昌奏疏〉。
- (198) (清)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澳門〉。
- (199) (清)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 (201) (207) (208)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ó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R.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22.
- (202) 達爾波《東土之寶》，轉引自郭永亮《澳門香港早期關係》第3章《澳門舊城牆界考》，頁20。
- (203) 《明清史料》乙編第7本《澳夷築城殘稿》，頁614。
- (204)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36。
- (205) (葡)徐薩斯著，黃鴻釗等譯《歷史上的澳門》，第58頁。
- (206) 《明熹宗實錄》卷41，崇禎三年十二月丙辰條。
- (209) 轉引自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澳門》。案：今本《澳門記略》不見此條。
- (210) (清)汪楫《崇禎長編》卷41，崇禎三年十二月丙辰條。
- (211) (葡)雷曾德〈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1992年第10期。白樂嘉認為，該圖成於1632年，見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 28.
- (212)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6-37。
- (213)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頁147。
- (214) (清)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澳門〉。
- (215)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950-952; 博卡羅〈要塞圖冊〉，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4章“澳門早期炮臺”，頁27。
- (216)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ó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 R. 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p. 20-21.
- (217) (219) (220)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4章“澳門早期炮臺”，頁32；頁32；頁33。
- (218)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ó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R.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p. 19-20.
- (221)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 92; 博卡羅〈要塞圖冊〉，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 (222)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God in China, by António Bocarro, Chronicler-in-Chief of the State of India”, in C.R.Boxer ed. and trans.,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16;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 of Macau*, pp. 63-64; 博卡羅〈要塞圖冊〉，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 (223) (224)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73-74; 博卡羅〈要塞圖冊〉，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4章“澳門早期炮臺”，頁31。
- (225) 原圖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歷史地圖精選》，頁18-19。
- (226) (葡)博卡羅《要塞圖冊》除上述六炮臺外，還有聖伯多祿及聖若奧兩座炮臺，而閔明我 (D. F. Navarrete) 〈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稱澳門有一座大炮臺、七座小炮臺，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 (227) (葡)雷曾德〈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6-37。
- (228) (232) (234) (237)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4章“澳門早期炮臺”，頁34；頁37；頁34；頁37。
- (229) (葡)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6。
- (230) (葡)雷曾德〈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白樂嘉認為，該圖成於1632年，當以圖中已建起的聖保祿教堂前尚未見完成於1637年。參見 J. M. Braga, *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 p. 28.
- (231) Jorge Graça, *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 pp. 73-74; 博卡羅〈要塞圖冊〉，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據郭永亮言，沙梨頭炮在1640年被明政府逼令拆毀，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4章“澳門早期炮臺”，頁34；1665年《澳門平面圖》上亦未標“沙梨頭炮臺”。
- (233) (235) (236)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之《澳門城（1590年代）》，頁35及頁36-37；
- (238) (葡)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頁103。
- (239) 博卡羅《要塞圖冊》乃記明末澳門炮臺之數，《澳門記略》乃記乾隆時各臺之位，而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32《方略》21則是記道光時各炮臺之炮位，故數目歧異較大。但從上表卻可以看出，除南環（灣）炮臺之炮位設置是逐漸遞減外，其餘各炮臺均是愈往愈有增加。